



共产主义者

◀ 月刊第7期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 2025.11

时事

张雪峰现象
总分析

理论

什么是
“法西斯
主义”？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国统一的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种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有机会投著实践的理论纲领因为背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实支持，而不得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世界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国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双手开拓的更美好的世界！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

我们是
谁

官方网站：
bolshhevikleninists.com



《共产主义者》

官方YOUTUBE中文播客

- 总结历史
- 学习理论
- 时事评析
- 文艺评论
- 组织建设
- 政治/生活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时事

I	查理科克之死——我们无需同情	05
II	革命的病症不是“过激”——捍卫尼泊尔革命的教训	08
III	环保少女被捕、释放和以色列统治阶级的变本加厉	10
IV	张雪峰现象总分析	15

30 所谓“极权主义”的神话 V

36 改良主义批判 VI

42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VII

53 捍卫和坚持民主集中制 VIII

63 当代政治报的危机与路线 IX

71 论仕途主义问题之二：革命者什么样的“上进心”是合适 X

73 《怎么办？》导读 XI

77 信仰抗命：中共党国体制下的宗教问题 XII

理论

查理科克之死——我们无需同情

2025年9月10日，美国犹他州的犹他谷大学爆发出一声枪响。保守派青年政治组织“Turning Point USA”（美国转折点）的联合创始人、长期在全美大学巡回演讲的极右派查理·柯克当场中枪身亡。凶手在混乱中被警方逮捕，随后面临一级谋杀等重罪指控。事件发生后，FBI、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多家执法部门联合介入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全美降半旗，为对柯克“哀悼与致敬”，在网络空间，舆论却被迅速分化为极端的两派：一边是共和党把柯克塑造成“言论自由的殉道者”，另一边是民主党“左翼”指出这是右翼长期煽动仇恨的恶果。

查理·柯克是美国青年右翼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以猛烈抨击“左翼政治正确”和进步运动著称。他的组织Turning Point USA多年来在大学校园中不断动员年轻人支持保守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与多元文化。他本人在公开场合曾发表过许多争议性言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句就是：“同理心是二十世纪创造出来的假的。”这句话无疑揭示了他的世界观：把人类的共情与善意视为虚构的幻象，否认情感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最终将冷酷与竞争当作自然法则，全心全意支持达尔文主义。讽刺的是，正是这样一个否认同理心的人，死后却被要求得到全社会的无限同情。

但如果我们停留在这种极端的非辩证二维思维——死亡就是坏事、杀人就是恶行，那我们就会陷入浮于表面的、空洞的、脱离实际的空想，从而，忽略了其服务于阶级统治的本质，认为坏就是坏，好就是好，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因果会被孤立。而客观现实恰恰告诉我们：坏事发生在坏人身上，有时会是好事，这正是形式逻辑（一件事只能是好或坏的）的荒谬之处——它试图脱离人或阶级的目的去作分析，脱离客观世界的复杂联系去作偏执的猜测，脱离变化的客观条件去做僵死的判断。柯克的死是暴力的结果，但这个暴力的结果真的是糟糕的结果吗？恐怕未必！正是他本人的思想长期制造仇恨、煽动对立、否认人类共情，所以他死在了自己的主张之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讽刺笑话！

然而，透过问题看本质，他的死亡并非一切的终结，反而为我们揭露了问题的根源。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这样的暴力会不断发生？为什么美国社会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各种群体之间的相争？激发两种极端的碰撞？难道这都是因为枪支吗？并不是这个原因，也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枪支上，甚至不能孤立的去看待一个物体。诚然，枪支自出生以来就为攻击存在，但这不代表因为“枪支”，所以“血腥事件”。

真正的点在于，这一切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是那些在现有体制无法调节的矛盾的表征。暴力之所以频繁爆发，是因为阶级矛盾在社会中根本无法调和。财富集中、社会分裂、政治极化、教育与医疗的差距、心理健康体系的破产，这一切不仅仅是起因，更是现在的制度一定会到达的结果，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可调和的。持枪者在这样的环境里，不仅拥有了工具，更获得了仇恨与立场。枪只是媒介，车也可以是，刀也可以是，真正的原因是这个制度本身。这个制度注定产生这样的结果，这不是立场的偏见，而是事实的推演。国家本身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自然产生这样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美国政坛和媒体对此却采取了高度表演化的方式来应对。共和党方面立即把矛头指向“左派极端分子”，声称这是“左翼对保守派的猎杀”。他们在镜头前义正辞严地批评对方“没有人性”，甚至嘲讽民主党在网络上有人幸灾乐祸。可现实是，共和党自己才是支持持枪的最坚定的信徒，他们为枪支付出行动，阻挠一切实质性的枪支管制法案。共和党拥抱枪支自由，同时又在怒斥枪支“暴力”，这何尝不是一种可笑的左右脑互搏？更可笑的是，政府所谓的“同情心”只是利用一切，甚至包括他们自己。他们为以色列的轰炸喝彩，为俄罗斯的扩张找理由，却极少有人为乌克兰平民或巴勒斯坦儿童发声，就连之前曾经支持过乌克兰的人也逐渐转为俄罗斯派。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只是狗屁，都是只是他们想要控制谁能永垂青史，谁逐渐被遗忘。

查理·柯克死后，美国总统下令全国联邦建筑降半旗。可是，当乔治·弗洛伊德因警察暴力而窒息身亡，当无数黑人在街头倒下，当孩子们在校园枪口下失去生命，这个国家何曾为他们降过一次旗？国家仪式的差别恰恰揭示了真相：美国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公共利益共同体，而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只会为有利于统治阶级叙事的人物动员悲悯，却从未为底层人民的苦难付出同等的尊重。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后花园，而一切人民对他们来说都是农场里的猪猡，要么杀掉吃肉，要么养着当宠物。

柯克事件之后的舆论走向，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点。这两个党派并没有真正讨论如何避免悲剧重演，他们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消费死者身上，就连共和党也不在乎它们最忠诚的信徒。民主党极力为此叫好，也只是为了政治争夺，共和党高喊“左派猎杀右派”，不是因为它真的在乎柯克，而是因为这只是一个为了政治争夺而用的棋子。在这样的政治操弄之下，暴力不仅不会被消解，反而会在下一轮政治极化中更加频繁地重现，但这不就是他们想要的吗？

这一切并不令人意外，查理·柯克的枪杀案不是最后一件这样的事，它不过是漫长时间中的一根稻草，压在骆驼的背上，可没有人知道，哪根稻草会是最后一根，也许这次，也许下一次，也许更加漫长。这种可悲可笑的事不会因为政客的演讲而消失，也不会因为降半旗而终止。只要阶级存在，只要资本积累不断，社会的问题不再得到缓解，一切将会重现。要打破这一死循环，唯一的出路就是消除阶级，推翻国家机器，把人类从阶级暴力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因此，我们必须拒绝那种把暴力仅仅看作两极的对与错，而是要与世间万物因果联系起来，辩证地看待。一切事物永远不是一成不变的，善恶的判断不是由形式决定的，而是根据阶级统治的需要而转移的。我们必须揭露共和党人虚伪的选择性同情，

忠诚的信徒。民主党极力为此叫好，也只是为了政治争夺，共和党高喊“左派猎杀右派”，不是因为它真的在乎柯克，而是因为这只是一个为了政治争夺而用的棋子。在这样的政治操弄之下，暴力不仅不会被消解，反而会在下一轮政治极化中更加频繁地重现，但这不就是他们想要的吗？

这一切并不令人意外，查理·柯克的枪杀案不是最后一件这样的事，它不过是漫长时间中的一根稻草，压在骆驼的背上，可没有人知道，哪根稻草会是最后一根，也许这次，也许下一次，也许更加漫长。这种可悲可笑的事不会因为政客的演讲而消失，也不会因为降半旗而终止。只要阶级存在，只要资本积累不断，社会的问题不再得到缓解，一切将会重现。要打破这一死循环，唯一的出路就是消除阶级，推翻国家机器，把人类从阶级暴力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因此，我们必须拒绝那种把暴力仅仅看作两极的对与错，而是要与世间万物因果联系起来，辩证地看待。一切事物永远不是一成不变的，善恶的判断不是由形式决定的，而是根据阶级统治的需要而转移的。我们必须揭露共和党人虚伪的选择性同情，必须看穿国家降半旗仪式的本质，必须认识到所谓的美国民主价值观只是统治阶级的幻象。查理·柯克的死亡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在这个体系里，人的自我价值只是统治阶级的玩具，被它们定义，被它们放弃。真正的出路，是去追问：为什么社会矛盾永远无法调和？而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推翻这个制度，废除国家机器，人人才能平等，人人才能掌握自己，才能解放自己的意志，实现自我实现，把人类从这样的矛盾中解放出来。

II

革命的病症不是“过激” ——捍卫尼泊尔革命的教训

尼泊尔革命的火在外部的绞杀和内部的背叛后，又一次失败了，如同之前尼共放下武器将自己融入资本主义制度中一样。临时政府保留了旧政府的官员和旧国家机器的暴力机关，引发革命的社会问题一点都没有得到解决。最激进的学生代表逐一落网，随即填充的机会主义者丝毫不愿意掩饰自己背离群众、加入统治队伍分一杯羹的野心。

它高潮时引起的共鸣被低潮后留下的回声所取代。正如每一次国外大规模社会运动爆发后他们所处理的方法一样，中国政府和支持它的那些愚昧落后的喉舌清楚消息封锁不住，但可以被扭曲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中文互联网网上“粉红公知”们立刻对革命的尸体开展清算：他们不惜一切手段，将抗议、示威、革命贬低为暴动、混沌、灾难，把一切力图掌握自己命运的普通人描绘成被牵着鼻子走的庸夫、不懂得“大局观”的过激者。

在他们的口径里，美国仿佛一个无所不能的精神控制机器，世界各处的一切抗议运动都会与CIA有染。我们不否认帝国主义者常常出于自身利益干涉他国内政、制造舆论，中国政府同理。但是，烈焰不只需要火苗而需要燃料，民愤不只要煽动而要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宣传战在其中只是起到引导方向的作用，而不是矛盾本身的制造者；换言之，NGO组织长期对尼泊尔政治的深透，不是导致革命的起因，而是将革命引导到错误方向的原因。

这个事实不容辩驳，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不得不假惺惺地承认除了美国的渗透外，另有例如腐败、政治专制、青年失业率高、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存在。但他们本末倒置地将这些根本原因形容成了次要因素，意思是如果美国不进行干涉、尼泊尔不常年存在这些NGO组织，那这些因素本身不会导致革命。我们想问：为什么屡屡禁止携带火种进山，山火仍接连不断呢？因为山火本身就是不需要人为引燃、自然界的一种自我调节的现象，太阳光本身导致的高温就会常态化地导致山火清理低层植被。人可以成为引火者，但没有人，干枯的落叶层照样存在。尼泊尔群众参与这场革命是完全正当且英勇的，有没有NGO，这场革命也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们不反对尼泊尔革命，而反对错误引导革命的NGO学生组织的领导层。一场深刻的革命是解决尼泊尔社会矛盾的唯一出路，GenZ如果想要换来一个更公平的社会，那不可能通过“建设国家”、“勤劳奉献”达成。革命的问题不在于它“过于激进”了，而是缺乏科学社会主义的引导，它在本质上过于保守、触及矛盾的程

度不够深刻。

我们要什么态度？绝对不是和这群人一样看笑话，“尼泊尔人被牵着鼻子走，去搞一团糟，就不该上街的”。我们要的是：“英勇抗争的尼泊尔群众遭遇了背叛，运动收到了挫败，他们将从经验中学习，下次做的更好。”

这里坚决要扒开那些傲慢的“评论家”的皮！他们自以为是地说，尼泊尔人头脑简单，只懂得摧毁旧制度，又不懂得建立新制度。这属于“五十步笑百步”，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甘心带着锁链接的人，在嘲笑胆敢尝试者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他们连做初步准备的打算都没有，因为他们不是认为革命的方法不够好，而是根本上反对革命，认为革命带来的动荡不如安稳为奴。

他们不配这样评价尼泊尔青年和群众：做的不够好，胜过根本不做的懦夫！中国青年，尼泊尔的惨败不该吓坏我们、动摇我们，而是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千禧一代有作为先锋带领全体群众粉碎统治阶级专制的力量。一切神圣的、不容侵犯的制度，在街头上都被踩在脚下了，革命从来不是不可能，只是他们用一切途径向我们灌输政府的强大和我们个人的弱小与微不足道。中国青年必须联合、组织起来，而且要比尼泊尔的同辈们做的更好。我们要在一个革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革命而非怅惘的一代！

我们还有什么值得失去吗？时代的红利我们什么都沾不上，危机的负担却让我们自己承担。“景气”的中国资本主义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们要用一切方法彻底丢弃它、摧毁它！

III

环保少女被捕、释放和以色列统治阶级的变本加厉

2003 年出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格蕾塔·通贝里，因其激进地频繁参与气候、环境相关宣传，发表相关言论，故被称为“环保少女”从 8 岁开始，通贝里就过上了不吃肉的生活，11 岁时被确诊患上阿斯伯格综合征、强迫症和选择性缄默症三种精神类疾病。从 11 岁到 15 岁，多次参加与气候问题有关的罢课游行。2018 年发起环保罢课行动，并在瑞典国会前举起环保罢课牌子由此打出名声，得到广泛关注，次年一月被邀请至达沃斯世界论坛，2 月在 TED 发表演讲，8 月 14 日，从英国普利茅斯出发，乘零排放帆船耗时 14 天横渡北大西洋，计划参加 9 月份在纽约举办的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12 月，再次横渡大西洋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2020 年 1 月 21 日，在瑞士达沃斯参加第 50 届世界经济论坛并发言。通贝里对于政治的想法远远不止于气候。2025 年 6 月 1 日，通贝里等 11 人已搭乘“玛德琳”号帆船前往加沙。6 月 9 日凌晨，以色列证实“马德琳”号船只已被以方控制，乘员遭以方逮捕并将返回各自所属国家。

10 月 1 日环保少女卷土重来，本次规模更大，所乘坐的全球坚韧船队，（“Global Sumud Flotilla”“苏穆德”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坚定不移”）是由 44 个国家和地区组建的人道主义救援船队，2025 年 8 月 31 日首次计划从西班牙巴塞罗那起航，后因天气原因推迟至 9 月 1 日出发，船只数量从 20 艘增至 51 艘，计划抵达加沙地带以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锁运送援助物资，共有来自超过 44 个国家的超 450 名活动人士参加，包括来自近 20 个国家的环保主义者、人权律师、前政界人士和公民团体成员。并在航行期间同步开展示威、露营等抗议活动。10 月 1 日以色列逮捕了此次行动的所有成员，并于 6 号释放了 171 名被扣人员。事后在雅典机场，环保少女给发表了演讲（Greta Thunberg speaks against ‘genocide’ in Gaza after Flotilla crews detained, deported by Israel），通贝里在演讲中称：

“我就直说了，我们每个人眼前正在发生一场种族灭绝，一场正在现场直播的种族灭绝。没人有权说，我们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未来没有人可以说，我们当时并不知情。根据国际法，各国在法律义务采取行动，去防止和阻止种族灭绝。”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举措，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政府采取最基本的行动。我们的国际体系背叛了巴勒斯坦人，他们甚至无法阻止最严重的战争罪行发生。”

“我无法理解，竟然有人如此邪恶。你们故意让数百万在非法围困中受困的人挨饿，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持续数十年的令人窒息的压迫的延续。”

“全球坚韧船队”试图从海上打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非法围困，“这是全球团结的体现，在国际社会未能采取行动的时候，人们挺身而出。”

“全球坚韧船队”的援助任务本不应该存在，但西方国家纵容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这项任务是一种最终手段，不得不进行这项任务，是一种耻辱。”

通贝里表示：“我可以长时间谈论我们在被囚禁期间遭受的虐待的不公待遇，但那不是事情的重点。重点是以色列持续扩大其种族灭绝和大规模破坏行为，他们意图进行种族灭绝，试图在我们眼前抹去一整个民族和国家。”

之后又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了近 5 分钟长的视频 (b 站打开: BV18MxDzgExk)

中国的网民对于环保少女向来是比较负面的评价，但于此件事，有相当多的中国网友在评论区表达了认可，认为其“知行合一”“值得肯定”，全球坚韧船队并没有打破加沙地区的封锁，也没有完成此行的物质目的（输送援助），而在舆论战层面则完全实现了其设想。

政治生态和个人的政治资本

以色列对加沙地区旷日持久的封锁，使得西方很多原本对以色列抱有好感或者中立态度的国家都对其在加沙地区的所作所为大失所望。在本次的人道主义救援当中，单从集结的人员国籍来看，确实能相当大程度上反映出逐渐的失去民心，对于这次行动，或者说通贝里个人的本次行为而言，我们要给予一定的肯定，因为至少揭露、有去帮助正在遭受战争蹂躏的百姓的行动。但这远远不能够称得上是阶级斗争性质的。虽然在船队当中也有平常百姓 / 群众，整个事件的主角完全是通贝里以及本来就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担任过一官半职的前政府雇员或者律师。

不少人认为此次船队乃是政治作秀，确实，对于想要在资本主义世界之下得到资本家的青睐，得到市场的青睐，就必须敢想敢说，敢说敢干，就得说出大言不惭的话，获取流量和同情，吸引话题。通贝里这个从十几岁就开始踏入政治界的小姑娘不可能不谙此理，她和身后的几百人都有追求正义的心，但不能排除也有获取政治资本和个人野心的驱使。

早在几年之前，让通贝里走进家喻户晓的句子就是“*How dare you*”“你怎么敢”，年纪小小的通贝里时常以一副苦大仇深的面容和口气说出一些攻击性十足的话，或许她确实是在发表内心的想法，但对于一个十几岁出头、出身并不寒微，而且身处发达国家的一个小姑娘来说，很难不让人怀疑有人在后面操作、或者实在演，至少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这种出身的小女孩在这个年纪都是积极眼光、对一切充满好奇的。而不是这么早谙世事。而整个新闻界似乎对这个现象习以为常，甚至不以为怪。通贝里作为个人她能够起到的作用是甚小的，但如此多的政治资源和曝光机会是从谁手里争取来的呢？向来资本主义世界有些所谓的民主派和改良派过于专注于这个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甚重要，甚至只是道德满足的主张，他们基本只谈气候变化、

性少数，而有意地掩盖真正的社会最根本的阶级矛盾，他们是通贝里背后的力量和真正的主导。

很多人自由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是绝对好的，诚然相比较于中国的完全政治压抑状态，西方明显活跃的多，政治气氛也明显更为开放，但这种活跃和开放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吗？是能够真正让那些为了大多数劳动群体发声的人不惜得罪资本的人得到政治资本的公平吗？肯定不是，通贝里此前的“环保少女”形象是对大多数人没什么吸引力的，但这次船队赴加沙却引起了巨大反响，此后她会更深入地投入政治，对于资本主义世界获取流量和关注的手段她只会越来越清晰。

以色列

在近代从以民族情绪出发的锡安主义后来受到英国帝国主义支持、到纳粹德国对数百万犹太人的大屠杀让持续数千年的反犹浪潮达到了顶峰，后在1948年得到世界首强美国支持，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反对的以色列时隔近1900年后成功复国，这样一种故事性十足的复国史无疑对于拥趸者来说是浪漫的，但这个国家的建立并不是基于被统治阶级、被压迫者的奋起反抗、或者自发的起义，尽管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于犹太人确实劣迹斑斑，但整个国家是由少部分精英分子在美英资本势力（犹太裔资本家们分量很重）的支持和民族主义的宣传和鼓动下大规模地全球各地的犹太精英移民而成的，犹太裔工人/农民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相对有限。这个流着“奶与蜜”的、被真神许诺给犹太人的土地，对真正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基层劳动犹太工人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仍然是小的，至少相对于得到了实在市场和土地的资本家们来说，是微乎其微的，承担完全次要、边缘的角色的。而在战争中，对于任何平民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唯一从中获利的可能也只是胜利一方的统治阶级，他们或许通过外部矛盾转移内部阶级矛盾，为了“以战养政”。

本次巴以冲突两年以来根据加沙卫生部门提供的数据已经造成了67000人死亡，169000人受伤，并有数千人失踪，但截至目前为止，仅仅达成了停火协议，而且还是第一阶段。

以色列10日凌晨宣布，已批准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签署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从各方释放的信息看，协议内容包括加沙立即停火、以军在加沙地带后撤、以色列与哈马斯互换被扣押人员以及人道主义物资进入加沙等。

从一开始内塔尼亚胡政府对于，巴勒斯坦的强硬态度，一步步走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诟病和批评，对于以色列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坚决站在美国一方的中东首强而言，在舆论上开始越来越被动，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以色列议会中，在议员们面前发言时表示，他认为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都是“好人”，然后他转向赫尔佐格说：

“我有个主意，你为什么不能赦免内塔尼亚胡呢？”

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已证明自己是最出色的“战时”领导人之一。在谈到腐败指控以及所谓收受雪茄和香槟等礼物的事情时，这位美国总统反问：

“谁会在乎呢？”

其实早在今年 6 月，特朗普就发表过类似言论。

这就不得不提到作为以色列政府首脑的内塔尼亚胡在任期内遭受到的种种诉讼可以追溯到 2020 年年初，以色列检方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 3 项指控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之后内塔尼亚胡就向议会寻求豁免，同年 5 月，法院首次开庭审理该案，内塔尼亚胡因此成为以色列首位接受司法审理的在任总理。在 2023 年，内塔尼亚胡就着手推动进行司法改革，削弱司法部门对行政和议会实施的影响，国际刑事法院（ICC）对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了逮捕令，指控他们在战争期间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包括将饥饿作为战争手段）。2024 年 12 月 10 日，内塔尼亚胡首次因涉嫌贪腐案出庭作证。据以媒体报道，如果罪名成立，内塔尼亚胡因受贿面临的刑罚将是最高 10 年监禁，因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面临的刑罚将是共计最高 3 年监禁。

在以色列国内，不免有一种声音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以战养政”策略，许多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有延长或加剧战争的动机，目的是为了逃避或拖延针对他的腐败案审判。作为以色列首位在任期间被起诉的总理，他面临受贿、欺诈和背信的指控，如果罪名成立可能面临监禁。战争使他得以推迟法庭听证会，并在公共危机中维持权力，转移公众对他法律困境的关注。不少人怀疑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对 2023 年 10 月 7 日 Hamas 袭击事件中出现的巨大安全疏失负有责任，甚至可能本来内塔尼亚胡明知道知道 Hamas 要突袭，但他放任不管，以此来掩盖腐败问题，而持续的战争可以让他推迟对此次失职的官方调查和问责，从而维护其政治生涯。对于泽连斯基来说也是如此，他又何曾不恐惧战后面临对其军事策略、人员损失、腐败问题或战时权力使用的清算，以及随着战争的深入，他的支持率只会持续走低，为了保证手中的权力，他也只能进一步烘托俄国威胁和强硬手段的必要性。通过外部矛盾转移内部阶级矛盾的案例在历史上层出不穷。

渲染民族矛盾、外部威胁来延长统治、转移视线，统治阶级的这些花招和把戏于他们而言甚少造成多大伤害，毕竟坐在办公室里面喝着咖啡指挥着战争、看着冰冷的数字，没有太大风险。而对于敌方阵营中的老百姓，他们根本不在意，哪怕对于犹太这个民族来说在上世纪遭遇了多么大的苦难，他们也有样学样用在巴勒斯坦人当中。不止这些，对于普通的犹太劳动人民而言，他们什么都没有做，而且他们还有可能成为战场上的棋子，但是就莫名地被人所鄙视、厌恶，甚至某些从未去过以色列，仅仅因为犹太人血统就遭受攻击。耶路撒冷的统治阶级不光对他们视为敌人的巴勒斯坦居民实施封锁、虐待，还让无辜的劳动群众也成为众矢之的，并且是近在眼前、唾手可得的众矢之的，统治阶级是不能轻易接触到的，但身边的犹太人可以供那些受统治阶级蛊惑影响的人发泄心中的怒火。不光在欧美国家，甚至在素来和犹太民族接触不深的中国，很多人都因为反西方势力的撻掇和以色列的暴力野蛮而变成了反犹太主义者，在网络上甚至希特勒都被很多人“肯定了”、“平反昭雪”了。

张雪峰现象总分析

2025年9月24日，曾经红极一时的网络志愿填报辅导导师张雪峰多平台主账号均被禁止关注。尽管直播仍可以进行，但随后南方网称其“将动摇国家长远发展的人才根基”，也算是给其半个盖棺定论了。对于这个结果，有人唉声叹气，有人弹冠相庆，但是对张雪峰的认识与争论大多局限在他本人身上。共产主义者对这个现象的分析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一句这样的批评。张雪峰对我们来说是一面镜子，可以很好地映照出我们社会现在面临的状态。

功利主义辩证法

张雪峰最主要的本业就是高考志愿填报的咨询工作。至于志愿填报活动所遵循的原则，对他而言，可以说有且仅有一条：如何借此找到更好的就业，从而最大化填报者的收益。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事实莫过于2023年6月由他引发的新闻学争端：当家长询问他，学生执意报考新闻学专业该如何是好时，他斩钉截铁地说，即使把学生打晕也要换个专业。这种偏激的用语立刻使得舆论发酵。讨论主要集中在：人生道路的选择应当更看重理想，还是更看重功利？

有人说，理想很重要，因为你必须找到属于你的人生意义，他们对张雪峰大加挞伐，说他践踏了某个学科或行业当中某种神圣的东西；有人说，功利很重要，因为你必须填饱肚子，他们对张雪峰大加欣赏，认为他在帮助没有信息渠道的人“避坑”。

某种程度上来说，功利主义者的言论还具有一定的正确性。绝大多数大学生一毕业，就不得不面临一个这样的事实：他们没有生产资料，父母也没法养他们一辈子。为了以一个相对“体面”的人的身份正当地活下去，他们必须成为所谓“人力资源”，也就是出卖自己劳动力，以无产阶级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上。并且大学毕业生属于受到过高等教育的无产阶级，是相对来说具有更多知识的无产阶级，就这一重形式来说，由于现代知识分工的影响，他们的就业与否会受到所学专业内容的制约。在吃饱饭这一层前提下，专业的具体内容就几乎完全被忽略了、省去了，剩下的唯一的需要考虑的就是该专业的就业情况，也就是说，学生曾经花在专业知识上的学习时间，究竟能否顺利地转化为金钱。

在这种思想中就已经隐含着对持有“报考专业要遵从心中理想”这样论点的人的一个反击：它以这种近似黑色幽默的方式展示了马克思的“人类一般劳动”的概念，

尽管是不完全地展示出来。它选择对各个行业的特殊性质、对每个人的不同个性避而不谈，转而去寻找一个真正可以在专业间相互比较的尺度——经济利益，或者说工资收入。在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前途面前，一切个人的喜好、一切与社会整体相关的责任感、一切提倡奉献的意识形态规训，在这里都被瓦解了，它们最终都为那一个唯一的、几乎看不出任意专业之间有什么区别的尺度让路。更进一步，对特定专业的迷恋还会被认为是有害的，因为无论你从事何种特殊形式的劳动，最终能够评价你的还是“人类一般劳动的结晶”——货币，背弃它就等于背弃了现代人最普遍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甚至这种比较本身也是一种奢侈，许多大学毕业生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工资多少的问题，而是能否就业的问题，是他们作为“拥有知识的无产阶级”能不能入资本家法眼的问题。“3000块钱招不到一个农民工，但是可以招到一个大学生”。因此，辩护士们扯什么大学的“神圣性”，说什么大学教育及其文凭的价值不能用大学生的工资衡量，那不过是转移视角、掩人耳目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下，经济利益必然是最为大多数人关心的问题。“上大学就能找到好工作”的承诺是过去数十年的历史与整个社会共同告诉学生的，可是如今这份承诺越来越难以兑现。市场经济的欺骗性便显露了出来：不要幻想“稳定的生活”能建筑在不稳定的市场之上。不关注经济利益，最终可能落得个没饭吃的下场。

我们可以看到，理想已经被功利提前宣判死刑了。用功利的视角来填报志愿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但是“理想”的角度本身其实还包含着这样一个幻想——即幻想其工作能够与生命的意义同一起来，幻想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劳动能够成为人类自我实现的方式。实际上，这个幻想本身就有着自相矛盾的成分，因为填报志愿本身就意味着学生或明或暗地接受了这样一套规则，也即把自己纳入到了“成绩-学历-工作”的再生产链条中。在这个体系中，绝大多数学生一开始就是为了成为雇佣劳动，为了成为一种能够投入劳动力市场的商品而应试的。既然他承认自己要成为一名雇佣劳动力，既然他在未来不得不将自己劳动的主导权卖出去，那么市场经济给他提供的唯一稳定性就是，他就、将会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他的劳动必将被不断地异化为畸形的劳动。这种畸形劳动势必会表现在各个方面，包括过长的劳动时间、过大的劳动密度、片面的劳动内容以及不合理的管理方式等等。也就是说，在普遍异化的前提下，绝大多数人的就业不可能同时就是“实现理想”“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哪怕有幸选到了心仪的专业，在后续的工作中，根本上还是会被资本的逻辑支配，最坏的情况下是连自己原本的爱好都丢失掉，在劳累、疲倦、抗拒、违心与窘迫中丢失掉属于自己的个性与理想。就这重意义来说，那些只谈理想而因此反对张雪峰的人，要么是已成功人士的“何不食肉糜”，要么是行业中的利益相关者。

此外，一些行业当中所谓的“职业道德”，所谓“神圣的、不容践踏的东西”，已经在张雪峰的解构下体无完肤了。张雪峰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哪些行业靠个人努力，或者说内卷会有点上升空间；那些行业更需要看“家世”，看“关系”，看“资源”。这是张雪峰“说真话”当中的另一大功劳，他毫不留情地揭穿了作为普遍状态的后门、腐败与“潜规则”，进一步解构着“努力一定会成功”的资本主义信条（尽管这种解构是无意识的，张雪峰本身就是努力拜物教的忠实信徒）。现在，努力不一定成功了，怎么办？至少得选一条通过努力能让我吃上饭的道路。现在高考分数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分数已经尘埃落定；现在重要的是选择方向，选择一个领导的亲戚不那么多的行业。

但是，从统治阶级的视角来看，必须要有人站出来反对张雪峰的功利主义。这不仅是被张雪峰否认的学校与专业相关者的问题，这是整个统治阶级的问题。几乎无论哪个大学，都会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学生的前途如何，而在于培育国家的“栋梁之材”。统治阶级更希望营造这样一个印象，好像每年的上千万大学生都是有热爱“学习”的、“理想”的、“爱国”的好青年。往小处说，这是一种用于 pua 学生的话术；往大处说，它适用于构建一种意识形态：似乎所有人在大学里都是平等的，都是相同的准备着为国贡献的知识分子。但是一毕业，这种意识形态的构建就立刻破产了。资产阶级或体制内官僚的子女可以用各种路数迅速为自己谋取高位，重新成为资产阶级或官僚；而无产阶级的子女，只要不是特别优秀以致于被统治阶级决定“收编”，就会重新回到无产阶级的状态，一遍又一遍地向各个公司投送简历，希望获得一个职位。表面上的理想主义是这种阶级分野的遮羞布；而功利主义的考量则完全不是这样，因为家庭以及“关系”能够提供的资源是显然地被关注到的，这样，只要再前进一步，即使在学校里，阶级的区分就容易被注意到。

因此，必须重视张雪峰所引发人们特别注意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学生们一开始被赋予了理想，到毕业时理想又被打压了下去？为什么理想与功利性的区分会存在？究竟是什么将我们带到了这样的选择面前，或者说，这个选择得以存在且广泛存在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教育制度的市场化逻辑

在高考之前，学生们往往被告诫：分数越高，你的选择权越大；高考一结束，“七分考三分报”的俚语就流传起来。它则旨在宣称：选择一个“好”专业很重要。这种前后的割裂是一个有趣的矛盾。当然，张雪峰以某种程度将这个矛盾弥合起来了。除了那些几乎没有争议的分数段（比如他会一脸嫌弃地斥责高考 300 分的考生“早干嘛去了”；分数稳上清北的考生大概率也不会找他咨询），对于每个具体的分数，他似乎很快就能给出一个或几个填报方案；对于还未经历高考洗礼的考生，他也会先拿出一套方案，以考生相对提高了的成绩为基础提出建议。对他来说，填报志愿是一件并不难的事；就好像每个分数都能有一个对应的填报志愿建议的表格，以给填报志愿者一个无需太多额外考虑的参考。

对于“七分考三分报”这句话来说，它强调志愿填报的意识上的原因已经能够很简单地看出来，也已经在前文提到过，就是以功利性的思维去评判各个专业的优劣。而强调志愿填报的另一个客观性的基础则在于“信息差”。考生与家长如何得知哪个专业在功利上是更优的呢？在志愿填报机构大规模出现在市场以前，志愿的填报还只能依靠主观的、零碎的感受的集合；而当张雪峰这样的人出现在公共视野以后，对就业状况信息的专门性收集与分析的职能就独立出来，并成为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暂且按下信息差本身不谈，后文中会有更详细的分析。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为何在似乎是为了提供信息的教育中仍然会产生信息差，并且这种信息差重要到成为升学过程中在学习能力之外的一大影响因素。

最简单也最直接的回答便是：志愿填报的信息与教育提供的知识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教育提供的知识用于筛选对它掌握更熟练的学生，而对志愿填报相关信息的掌控则涉及到学生主动选择的结果。但我们感到的矛盾，或者说尚待解决的问题正是

因此，必须重视张雪峰所引发人们特别注意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学生们一开始被赋予了理想，到毕业时理想又被打压了下去？为什么理想与功利性的区分会存在？究竟是什么将我们带到了这样的选择面前，或者说，这个选择得以存在且广泛存在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教育制度的市场化逻辑

在高考之前，学生们往往被告诫：分数越高，你的选择权越大；高考一结束，“七分考三分报”的俚语就流传起来。它则旨在宣称：选择一个“好”专业很重要。这种前后的割裂是一个有趣的矛盾。当然，张雪峰以某种程度将这个矛盾弥合起来了。除了那些几乎没有争议的分数段（比如他会一脸嫌弃地斥责高考300分的考生“早干嘛去了”；分数稳上清北的考生大概率也不会找他咨询），对于每个具体的分数，他似乎很快就能给出一个或几个填报方案；对于还未经历高考洗礼的考生，他也会先拿出一套方案，以考生相对提高了的成绩为基础提出建议。对他来说，填报志愿是一件并不难的事；就好像每个分数都能有一个对应的填报志愿建议的表格，以给填报志愿者一个无需太多额外考虑的参考。

对于“七分考三分报”这句话来说，它强调志愿填报的意识上的原因已经能够很简单地看出来，也已经在前文提到过，就是以功利性的思维去评判各个专业的优劣。而强调志愿填报的另一个客观性的基础则在于“信息差”。考生与家长如何得知哪个专业在功利上是更优的呢？在志愿填报机构大规模出现在市场以前，志愿的填报还只能依靠主观的、零碎的感受的集合；而当张雪峰这样的人出现在公共视野以后，对就业状况信息的专门性收集与分析的职能就独立出来，并成为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暂且按下信息差本身不谈，后文中会有更详细的分析。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为何在似乎是为了提供信息的教育中仍然会产生信息差，并且这种信息差重要到成为升学过程中在学习能力之外的一大影响因素。

最简单也最直接的回答便是：志愿填报的信息与教育提供的知识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教育提供的知识用于筛选对它掌握更熟练的学生，而对志愿填报相关信息的掌控则涉及到学生主动选择的结果。但我们感到的矛盾，或者说尚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在于：在这个系统中，被动的筛选与主动的选择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从高中升学的大学的这个过程，是如何既有被动筛选又有主动选择的？

就形式上来说，被动筛选的必要性表现于各个大学依据某种标准从优到劣分为多个等级，如清北、985、211、双一流、普通本科一直到大专等，当然其中还会有更细的划分，如985中还划分为上九、中九、末九；211也有顶流与末尾的差异；即使一本、二本、三本的区分明面上已经被废除了，但是它依旧是人们给不同的普通本科排序的重要依据。由于不同层次大学中教育资源的等差，必须依据某种标准将考生也大致分为不同的层次。筛选的过程以淘汰性的面孔出现，在这里，学生的分数作为统一的标准下对“智力因素”的检验结果，以量化的形式宣称不同分数的学生之间存在绝对的差异。

而主动选择的必要性则在于，一方面，同一层次的多个大学之间，教育资源的差异

不会太大；另一方面，不同的专业选择虽然在最后评判时都会回归到同一个标准，即功利性的标准，但是至少在形式上不同专业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内容差别与专业壁垒，有着市场供求的巨大差别，由于各种专业之间的差别与特殊性无法放在同一个天平上相互比较。在前一个方面中，主动选择机制的存在只是对被动筛选职能不能完全触及的地方的补充；在后一个方面中，主动选择则有着与被动筛选截然不同的基础。在这里，主动选择表示这个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学生的自由意志，并且不认为选择不同专业的学生之间在智力、学习能力等素质方面有什么不同。这仅仅是为了给学生们一个选择具体学习什么专业的机会；并且就业方向也会受到专业选择的制约。

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同一个专业当中，学校的层次越高，毕业生就业压力越小、薪资越高。而同一层次学校的不同专业（假设是体现该层次学校平均水平的专业）就业情况以及薪资情况的差异，则是难以事先判断的，通常以市场对该专业毕业生的需要与供给之间的对比决定。**于是我们终于可以回答前文的问题：在当下的教育体系中，被动筛选的过程正是市场经济下个人竞争的反映与延申；主动选择则是愈发细化的劳动分工的表现形式与预先分流。被动筛选与主动选择的结合，恰恰证明了，现在的教育制度的设计方式，正是市场经济的倒影。从另一个方面考虑，如果大学毕业生的工作问题没有与市场紧密地结合起来，那么被动筛选与主动选择就不会同时起重要作用。如文革时期，大学教育与市场的联系很弱，甚至连筛选性的原则都一度被打破。1996年以前，大学毕业生工作包分配，市场竞争尚未完全侵入教育制度内部，也很少听说过大规模的有关志愿填报的问题。

也有观点认为，高考中的分数竞争是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但是这种说法正如蒲鲁东认为价值是由稀缺性决定的一样荒谬。我们承认，特别是在过去，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确实制约了接受较高级教育的人数，这对竞争的产生存在一定影响。但是一方面，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不与学生供给的丰富性对比就没有意义；另一方面，如果承认分数竞争主要是基于功利性的考虑，那么也就会承认，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面对的工作难找的问题，不能只归因于他们不够努力从而未争取到“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而是资本主义下必然有一大批毕业生会落入与普通无产者一样的处境；由于拥有更高的技术而得以分享部分剩余价值的人，本来就只会是极少数。与资本主义下无产者之间不得不进行的激烈竞争相比，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作为一个因素的影响要小得多。正是因为人人都想要摆脱竞争、获得高薪，而这当中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方式是相对最容易的，因此才会围绕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引起激烈的竞争。更何况随着网络教育技术手段的逐步普及，这种稀缺性也在逐步消失。**因此，高考中的分数竞争的基础建立在市场经济中的个人竞争之上，建立在社会对学历的认可与学历越来越成为企业用工的唯一考量之上。如果不是企业对毕业生的要求越来越严苛，不是各种近乎钻牛角尖地以高学历高学府为筛选标准，学习专业知识又何必追求稀缺的资源呢？**

此外，还有一种常见的进路，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说明现代教育起源于工厂制度。这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批判角度，能够引导人们对教育异化的认识。但在我看来，仅仅强调现代教育与工厂之间的联系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了解教育本身与工厂，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以及资本主义普及对教育的根本性的影响。

教育与中产阶级

资本主义下的科技进步，一方面逐步消灭了落后的手工业者、小生产者，而代之以机器大工业。对传统行业的替代远非意味着社会分工程度的降低，反而使得分工更加发展了。在劳动性质方面，分工的发展则体现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进一步的分离与其对立的深化。一般来说，脑力劳动有着更大的前期投入的需要，脑力劳动者往往需要学习前置的知识体系才能够胜任劳动任务，而在同样时间内脑力劳动往往比体力劳动能对象化更多的价值。即使脑力劳动者从事的是没有直接生产商品的劳动，在资本家看来，他却能发挥到很多一般体力工人起到的不一样作用，如节约不变资本、高效配置资源、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扩大市场份额、包装品牌提供溢价、保证资金周转、提供法律支撑、及时止损等等。无论对单个资本家还是总体资本家来说，这股有意识调节生产（尽管是按资本家的意图调节，不能脱离资本主义框架）的力量都是不可小觑的，因此长期以来对一些顶尖的脑力劳动者的需求总是居高不下，有时还会带动一整个行业的脑力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金融行业。

我们能观察到，始终存在一个这样的阶层，他们虽然本质上是被企业雇佣的工人，但是却长期拥有很高的工资，以致于这个阶层的自我认同也发生了偏移。他们无比接近上流社会，并鄙视其它无产者（特别是体力无产者）。这类人有许多称呼，其中最知名的称呼之一便是“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属于中产阶级，我们这里不作讨论，仅讨论中产阶级中获取较高工资的工人贵族部分，下文的中产阶级都是指代工人贵族。具体来说，工人贵族包括会计、公司基层行政人员、商业雇员等非生产性工人，也包括较为核心的程序员、医生、部分私企雇佣的教师、飞行员、部分科学家等生产性工人；虽然前文将工人贵族与脑力劳动者联系起来，但是工人贵族并不都是脑力劳动者，一些技术工人虽然也从事体力劳动，但是由于工资较高也可以划入工人贵族行列当中；脑力劳动者显然也并不都是工人贵族）。虽然小资产阶级与工人贵族同属于通常所称的“中产阶级”，但是小资产阶级（如经营小商业的业主、自己拥有机床的小生产者等等）由于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而成为介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另一个阶级；工人贵族则只是收入较高、劳动条件较好的工人，并不拥有生产资料，本质上还是工人阶级，只是工人阶级中条件较好的一个阶层。

中产阶级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结构愈发复杂化，特别是管理层面的逐级划分，越是往上爬，越是有更高的工资。它的晋升机制当中对能力的看重最容易引起各种“努力拜物教”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客观层面上中产阶级的形成存在许多特殊的历史条件，他们却更注重自己的主观条件：他们是通过“努力”获得金钱、名誉与地位的。实际上，首先，他们的存在不过是社会生产扩大到一定程度后独立化出来的某些特殊职能的需要，而这些特殊职能的独立化本身就是由于分工的深化与凝固化；其次，他们能够以逐级晋升的方式获得部分剩余价值的分配权，也不过是官僚主义在企业内部应用的结果：一方面资本家需要在雇佣工人当中分化并培养出坚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整个企业的决策权都在向上集中，他们的这种分配权的取得不过是工人在企业决策中失位的结果。**狭隘的中产者们往往并不能意识到这些历史性的前提，他们能意识到的最深刻的道理就是，他们做的是与底层劳动者不同的工作，而这种工作往往需要“知识”，需要“胆识”，这种特质怎么可能为“顺从”**

且“愚笨”的体力工人所有呢？

恰巧的是，在人们的观念中，高等教育似乎刚好能够给人提供这种特质。高等教育提供知识不说；它甚至还能提供“胆识”，因为高等教育中的学生，作为分数竞争中的胜利者，不是必然有“超人之质”吗？继承着几十年前大学生稀缺的状况导致的大学生很容易成为中产阶层的状况，教育事实上一直在隐蔽地进行的其中一个意识形态战争就是，它不断地向学生灌输中产幻想。这种中产幻想不仅仅被灌输到学生身上，还随着中产阶层现象的普及，几乎成为一种社会的意志。而在各种道路中，教育被视为成为中产“最容易的路”，张雪峰之流的成功秘诀正是在迎合大多数人的中产幻想。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资本主义导致的颠倒：不再是赋予有知识有胆识的人以中产的地位，而是为了爬上中产的地位，必须要变得有知识有胆识。这里最重要的区别正在于中产阶层被当作了一种永恒的范畴。无论对于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中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是一个无需经过反思的事实，并且作为一系列行动的导向重新塑造了他们的行为逻辑。一些真的被中产神话灌输成功的学生拼了命地内卷，而“帮助学生成为中产”则成为一些学校官僚心安理得地压迫学生的话术。学生填报志愿的原则在各方面影响下，倾向于更有利可图的专业也是必然。因此，与其说张雪峰的功利主义导向“动摇国家长期人才发展根基”，不如说是市场竞争对教育制度的侵入动摇了国家长期人才发展根基；张雪峰只是一个利用这个历史条件的商人罢了。

去成为中产吧！教育尚余下的表面公平性给这个口号以极大的诱惑力。随着最底层劳动者生活条件相对地恶化，这股渴望成为中产的邪风越刮越盛。无论是农民的子女、工人的子女还是普通中产的子女，都在愈发恐慌的环境下被迫投入一年一度的大洗牌，毕竟说到底，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全都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给子女的生产资料。结果，所谓的“高考制度促进阶层流通”不过是一种用于掩饰的话术：因为这种流通不过是在底层工人与中产阶层之间流通；至于一跃而成为资本家的大学生人数可以说微乎其微。为了“这一辈子”，为了获得这个极为有限的通道的通行权，大部分无产阶级的子女只能陷入无尽的竞争中。但即使是这种信念也是极有问题的，因为中产阶层的广泛出现不过是一个历史性的现象。他们超出一般劳动力价值的工资部分，以整个企业的总利润为限。而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的长期利润率下降，随着各种经济危机的打击，随着管理方式的不断创新和人工智能的兴起对他们的替代作用，中产阶层也不可避免走向衰落，这个阶层将会不可避免地跟着资本主义的衰落重新回到普通的一般工人身边。

即使不论长期后的结果，短期内中产幻想的普及也会使教育受到极大影响。由于高中阶段应试教育给学生带来的极大痛苦，曾经有一种幻想，那就是实行所谓“素质教育”就好了。但是现实与幻想不同，因为一旦高考成绩证明素质教育无法使学生在教育竞争中超过按应试教育方式学习的学生，在各方的压力下，素质教育最终还是向应试教育靠拢。苏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全省的教育竞争使得市中与南京的高中这些本来拥有更多教育资源的高中按照县中的模式管理。这套逻辑事实上到了大学也管用。尽管有一种声音说“上了大学就轻松了”，实际上不过是大学的学术倾向以及给本科生上课带来的政绩对教师来说权重较低，使得教育不再占用教师的全部精力，只是更强调“自律”了而已。到了毕业之时，竞争的獠牙就亮了出来：最终你凭什么成为中产呢？不还是凭分数、凭学历、凭绩点吗？资本主义教育

天天宣称自己“解放个性”的假把式也被完全戳破了，到头来它仍旧不得不需要一个可以量化的评价标准，而这个量化本身就是与资本主义当中价值的独立形式联系在一起。

可以发现，教育上的评价标准最终不过是市场评价标准的扭曲版；教育上的竞争不过是市场上竞争的先导。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国民经济陷入萧条，这层教育与市场的衔接也愈发脆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育从市场中解放了出来，而是教育被迫用更加彻底的市场逻辑将自己全面异化。先前大学生可以轻易成为中产的时候，大学多是严进宽出，大学生躺平摆烂成为共识，教育上的竞争限制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便足矣。但是，当中产神话越来越难以维持，大学扩招却导致大学毕业生人数越来越多时，市场上个人竞争的激烈程度陡然激烈化，教育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必然因此而激烈化。一方面，重要考试的内卷程度总得来说在持续加深；另一方面，教育竞争也不得不前后延申、层层设卡，从小学一直持续到考研考博，而大学的生存环境从曾经的“天堂”也逐步地高中化。教育竞争所带来的痛苦也大大加深，不仅是程度上的加深，还在于时间的延长，使得青年长达十数年都不得不接受严酷竞争带来的折磨，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对抗情绪、煎熬、绝望乃至精神类疾病愈发常见也是正常的结果了。一些辩护士会说：“学生涉世未深，实际上上学比身处社会轻松多了。”但事实却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净土，没有某个地方能够真正逃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性的压迫。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产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因为这个阶层中个体的再生产显露出明显的不确定性，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子女本身的天赋与能力水平。各种补习班、教辅机构的漫天飞舞只是中产阶级试图稳定自身再生产的方式，但正是中产对这种额外教育的盲目追求反映了其本质上没有一个稳定的办法让子女过上与自己差不多的生活。不像资产阶级只需将所有权转移给子女就能使其再成为资本家、无产阶级的子女大概率还是成为无产阶级，中产阶级的预备成员从全国的无产阶级子女中被集中到大学里，这既产生了“似乎所有人都会成为中产阶级”的迷思，又揭示了“最终大部分人都无法成为中产阶级”的事实。只需要稍微转变一下思维，整个社会的阶级分野就会特别明显地展现出来。

在这里，张雪峰的存在，与其说是一个“指点迷津”的贵人，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投机的商人。有人说他“减少信息差”让一般家庭的子女不再踩坑，但实际上他存在与否对市场整体竞争的激烈程度几乎没有影响；他的影响力再大，也不过影响个别行业的人力资源供给，也不过是调整一下资源在不同行业间的分配。当然，张雪峰为何实际上对大局没有影响却仍然能够引发许多网民的青睐，这与他特殊的商业模式是相关的。

张雪峰的商业模式

张雪峰曾受到过网友各种正面评价，其中最高的莫过于“配享太庙”。即使在几乎被封的当下，也有不少人为他扼腕叹息。他受到赞誉的原因，大概也就是打破信息壁垒、让“底层的孩子”能够接触到平常接触不到的信息。然而，事实却是，张雪峰主要持股的苏州峰学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一对一咨询服务售价从8999元到17999元不等，对于真正的底层家庭而言，这是一个不小的数额，是绝对难

以负担的。也有人说，你已经免费地从张雪峰的直播中获取了不少的信息，怎么还幻想不交钱就继续获得更进一步的信息呢？

可见，在这里，信息被视为一种私有物；信息的交换自然也遵从市场交换的伦理。而对信息所有者来说，如果他主要地利用信息的某种特征使得自己的财产增值，他就是信息资本家，信息本身就是资本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最直观地看来，信息所有者要成为信息资本家，所做的就是卖出信息以换回货币。不过有一个与一般商品特别区别的点需要我们注意：卖出信息的边际成本很低，即使考虑了卖出信息同时附有的讲解劳动等信息服务，与一般劳动者甚至一些中产阶层的工资比较，其价格仍然高得令人咋舌。在这里，似乎存在的只是纯粹的供给与需求，提供信息的服务定价似乎并不能找到一个在供需之外的独立因素来决定。信息所有者想要多赚钱，最重要的方法似乎就只是以尽可能多的次数卖出他的信息服务。即使考虑到信息服务中投入的劳动，似乎也总是用较少的劳动换取更多的货币；而我们并不能把整个价格都归结为信息服务劳动加上搜集信息劳动创造出价值的反映。这个数量的自然制约因素，也仅仅取决于市场的大小和用于提供信息服务的时间。不过，随着网络舆论权力的崛起，能够卖出信息服务的数量还有另一层制约，也就是信息所有者的名声，或者说口碑。

张雪峰的多卖秘诀在于，他是一个十分擅于挑拨舆论的人。他的言语“粗俗”、生动直接、接地气，同时又带有绝对化的倾向，这本身就颇为传播学青睐。但仅仅这一点远远不够。不知是否故意，他还经常“冒犯”他人，从而挑起各种争论，但绝不身陷争论之中。如在不建议报考西南大学、不建议报考新闻学专业等等争端中，一旦有人将矛头指向他，他便立刻服软、道歉。在公众眼中，这些争论并没有明显地损害张雪峰的形象，并不是因为所谓“互联网没有记忆”，而是因为，对于大多数并不涉身其中的观众来说，张雪峰的言论并未触及他们的敏感点，于是他们便可以很容易置身事外，整个事件也就带上了某种表演的性质，不过是他谈笑风生、指点江山、“打破信息差”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张雪峰虽然在每次的直播中都要与许多家长连麦，但是真正看他直播、视频的粉丝群体中只会有一小部分转化为信息服务的购买者。那些真正体验过服务的人便难以集体化地以舆论的方式反映自身诉求的能力，他们的音量只会相当于海洋中的一滴水。此外，今年接受信息服务的人，要四年后才能有大概的具体意见，但是四年时间对互联网来说确实太长了；而这个时间本身就足以使张雪峰的神化形象固定下来。于是，张雪峰便可以长期处在舆论场上而屹立不倒。他可以宣称自己“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尽管任何人都不知道这句话是否出自真心，但是在那些自发维护他形象的粉丝群体中间，他的被神化的人的形象是愈发牢固了。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切舆论的操纵都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的基础上的，都是建立在中产幻想，从而努力拜物教，从而“读书有用论”深深刻在无产阶级的新常识还没有普及的结果。于是，资产阶级便可以利用那些有利于他们的常识，不断地将舆论引导到有利于他们的方向。

信息服务与垄断

不过我们还需要对张雪峰这种商业模式得以成立的可能性进行讨论，以更深刻地认识张雪峰模式运行的基础。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信息被视为私有物或某种商品实际

上是一种很奇怪的事，因为随着互联网通讯技术连接了全世界的数十亿人，信息复制、粘贴与传输的成本几乎可以视为0，这使得信息本身具有一种公共性，理论上说，一些信息只要能够正常地公开，就没有人能够给它定价再卖给另一个拥有基本互联网信息检索能力的人。信息所有者向买家提供信息，这个过程如果理解为商品交换就会解释不通。如果我们将信息理解为被交易的商品，那么商品交换的一个核心的因素，也就是商品所有权的变化，在这里并没有发生，信息只是自我复制了一次，由原来的只是由卖家持有变成了买卖双方共同持有。因此，在这里充当商品的应当是信息服务；信息本身实际上则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特殊性在下文会更详细地分析。服务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它能够辅助买家做出决策以最大化收益；这种服务本身也有交换价值，它凝聚了人类搜集、整理、研究以及在特定情况下运用信息的劳动，这种具体劳动当然蕴含了人类一般劳动。一般来说服务属于商品，并且是一种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的商品。

就好像普通的商品交换以独立的生产者的存在为前提，信息服务能够作为一种商品被出售也必须有其基础：信息差。有些人批评张雪峰是利用信息差敛财，这个指责就和批评资本家利用其他人不拥有生产资料的情况敛财是同样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的市场伦理中，它作为指责的效力仅仅限于指出这个事实，张雪峰对信息差的利用并不比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更没有道德效力。信息差的存在有其客观基础：首先是大量信息的搜集、整理、研究以及在特定情况下运用本身就需要耗费人的精力，或者说这些都是某种形式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平时在工厂里已经被榨干了精力与耐心，他们很少能够以单打独斗的形式去掌握填报志愿所需的大量信息。然后，随着学科体系本身的建立与发展导致的脑力劳动的分工与专业化、片面化也是信息差形成的基础。部分信息获取渠道的垄断也是一个原因。信息差是信息服务得以存在的前提。

因此，无论张雪峰如何宣称他“打破信息差”，根本上来说，他作为一个信息服务的提供者，他的商业模式中必然包含着人为维持信息差现状的举措。他在直播当中透露的信息，永远只能是零碎的、有限的、个别的信息，他从来没有一个计划，说他将从根本上提供一个系统化地解决信息差的方案；他甚至连如何搜寻这些信息的方法都从来没有透露过。他在直播中“免费”提供多少信息，是完全受他自己把控的。即使是花了大钱购买服务的人，也不意味着能够得到这种全面的信息。买家真正得到的与其说是系统化的信息，不如说是代理决策。这也可以证明，在这里被当作商品的不是信息本身，而是信息服务。

信息所有者的这种严控信息外泄的政策与信息本身的公共性的矛盾，恰恰体现了资本主义占有公共资源用于盈利的固有敛财方式。就好像生息资本导致了资本展现形式的颠倒一样，信息交易本身也展现了市场经济的一种颠倒。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信息不充分的问题是很少被考虑的，所有经济人都是理性人，都有着获取信息的渠道、对信息的充分了解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但是这类信息咨询机构的存在似乎反映了理性人假说作为一个理论的严重局限性。事实上，它不过是说明，资本主义远远达不到古典经济学家所能设想的最好状态而已。从整个社会的视角来看，信息咨询机构也只是改变了资源在整个社会生产当中的配置。假设这些配置优化一些，也不过相对减少了被浪费的价值量、增加了剩余价值量，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基本矛盾。此外，哪怕是信息咨询机构本身，由于其局限在一定行

业内，它所能提供的建议也总是局限的、为资本增值服务的，远远达不到足以调控社会生产的程度。张雪峰便是如此：四五年前，即使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已经出现了征兆，他却仍然强烈推荐考生报考土木工程专业；如今，土木学子找不到工作，他却嘲笑“早干嘛去了”。他的所有建议都是基于统计学的基础，可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又有谁依据历史数据就能够精准地预测某个行业好几年后的就业状况呢？结果就是，信息服务业越发达，其中的投机与诈骗也就越多。

张雪峰的公司里鲜闻特别严重的压榨与剥削。首先，这是张雪峰作为一个网红必要的形象管理；其次，某种程度上说，张雪峰本人也是提供信息服务的劳动者，更加使得这个问题很少被人讨论。至少目前，我们尚不知道张雪峰“含泪赚了几个亿”当中，有多少属于本人劳动创造的价值，有多少属于剩余价值，又有多少属于品牌溢价。不过，信息服务机构明显地依附于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因此其本身性质的难以确定并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整体的诸多性质。信息服务机构的任务是让被服务者尽量接近理性人所能够达到的对信息的了解程度。因此，在某一行业中，人们的状态距离理性人越远，对信息的了解越是匮乏，这个行业的信息咨询机构就越是可以利用悬殊的信息差聚敛大量钱财。高考志愿填报正是一个这样的领域：如果要达到理性人的状态，那么必须要对几乎所有专业、所有行业都有深入的了解，而绝大多数的家长恐怕连一个深入了解的专业都没有。自然，在这里就会有巨大的潜在市场。这正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性：它可以将任何事物都附上货币价值，将任何事物都纳入交易的范围，从而让资本的触手伸及任何一个行业。

表面上来说，这种“新行业”或“新商业模式”的不断发现总是被确证为“资本主义仍有活力”的表现，然而实际上一旦某个高利润率的行业被开辟出来，饥饿的资本就会疯狂涌入，在激烈的竞争中把利润率重新拉低。从长期来看，利润率总是不断降低的。比如信息咨询行业，在给生产资本提供信息服务时，它要作为资本拿去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利润，于是会发生与商业资本相类似的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在为非生产用途提供信息服务时，它也是给中产阶级越来越紧张的腰包又增添了一笔支出，加速地透支着中产阶级的未来；对其它商品的消费也因此而降低，从而对其它行业的资本循环又起了阻碍作用。因此，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信息服务行业本身也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我们可以将信息咨询支出主要地看作虽然并不能直接使资本增值，却不得不花费出去的非生产支出。

此外，如果信息服务的服务对象是直接的生产，如提供一定的技术咨询服务，那么这个信息服务的活动就是生产性的；如果不是，如张雪峰提供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那么这类信息服务就是非生产性的。在逻辑上，生产性信息服务是非生产性信息服务的起点。生产性信息服务提供商与生产性企业之间很显然会进行利润分割，但非生产性信息服务提供商所获得的利润中有一部分可能需要用某种形式的垄断加价来解释。拿一个剔除其它非决定的影响因素的情况来举例：比如网络卖课，假设并没有任何后续的需要追加大量劳动的服务。那么在这里，与前文提到的一样，卖课者所需承担的成本仅仅是课程录制过程中的讲授劳动；而他的收益则取决于该网络课程能卖出多少份。如果认为这份课程录像能够像其它商品一样蕴含着对象化了的劳动价值，那么我们找不到他劳动出创造的价值会在总共卖得多少钱时获得补偿，也无法得知他卖得的总价钱究竟是刚好补偿劳动创造的价值，还是多于或少于这个价值。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只是因为不知道而已。万能的市場过程最

终会告诉我们一切。

但是必须要考虑另一种可能的情况：一个人买得课程录像后以更低的价格，甚至免费提供给其他人，于是原课程录制者就立刻失去了市场。对这个倒卖课程的人来说，成本仅仅是原录制者成本的 $1/n$ ，但他仍然可能以同样的形式获得与原录制者同样甚至更多的货币。当然，这种情况恰恰是被法律禁止的，被视作对知识产权的侵害。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好像知识产权本身也可以“依法”转让，好像可以采取商品的形式，但是对信息产品的所有权与对一般商品的所有权存在着根本差异。在我们一般的理解中，对某个商品的所有权是与商品体本身共同归属于某个人；如果这个人以较市场价格更低的价格卖出这个商品，也是没有问题的，他虽然更容易卖出商品但是却在亏钱。到了信息商品这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倒卖者完全有可能赚钱。我们当然可以说，倒卖课程的行为类似于“盗窃”，但是相比于真正的盗窃，这里的盗窃并不导致原主失去了所有权，而是出现了不止一个出售同样商品的市场主体，让原主被迫陷入竞争，而新的出售者由于成本极低有着极大的优势。现在，只有通过“合法方式”获得对信息商品的（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的人才能卖，其他人，哪怕已经支付了购买它的货币，也不能卖。这不是相当于一种垄断吗？（这还需要与反倾销区分开来：倾销是资本家暂时降低售价以打败竞争对手的行为，只是为了达到垄断的状态；这里的倒卖反倒是打破了垄断加剧了竞争，是实行售卖行为的市场主体凭空增加了）因此，这里全部的矛盾就在于：信息本身具有的公共性与将信息视为私有物的矛盾。要缓解这个矛盾，只能引入法律的力量。

因此，通过对信息所有权（无论是著作权还是专利权或其它的权利形式）的法律保护，以及有意识地保持信息差的各种手段，信息所有者事实上对其信息拥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垄断权力。我们当然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商业模式：既然信息本身拥有公共性，那么被提供信息的可以视作是全社会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他可以向全社会发起“募捐”，达到他想要的额度之后，就将他所掌握的信息公开，相当于全社会向他购买了这个信息商品。但我们也观察到通用的模式与此并不相同，这固然有传统商品思维惯性的影响，但是我们或许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垄断。这种垄断正是表现在信息商品经营模式与信息公共性的矛盾上。当然，具体的情况与上文谈到的纯粹形式并不会完全相同。这是因为有的信息商品的经营模式会与提供信息服务的商业模式混杂在一起，比如专门雇佣教师为顾客讲课，这就更接近于我们能够理解的商品形式。但是如果将其录制下来，传到网上，性质就立刻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信息商品对传统商品范畴的突破正是基于技术的进步，同一件商品几乎不用花费什么多余的劳动就能够被（使用网络的）所有人使用（当然，我们还没讨论“使用”信息商品可能还需花费相应的劳动，即阅读或聆听、理解、思考、总结的劳动，总之即学习劳动。但是限于篇幅，我们暂且不在本文过多地探讨这个问题），所以这同样证明了商品以及私有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存在着被突破的可能——如果所有商品生产成本都能像信息商品这样少，那么一切用劳动衡量商品价值的做法将不再必要，一切确认某物为某人私有的做法将不会出现，从而一切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端都将会连同资本主义本身消失。

当然还需要一点解释：高考志愿填报相关的信息服务公司多如牛毛，凭什么说张雪峰就是“垄断者”呢？比较容易想到的解释是，垄断者不是张雪峰，而是全体掌握相关信息的公司。但是这些公司之间同样会有竞争，是否能认为，这些公司互相竞

争后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再乘以每份服务的单价，就相当于其提供的信息服务的全部价值呢？也不是。我们可以想象李火盆的志愿填报咨询公司突然崛起，由于其性价比和口碑都远高于张雪峰，挤占了张雪峰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么为了与李火盆竞争，张雪峰必然会降低其信息服务单价，结果反而是张雪峰提供信息服务的“价值”在两个方面都突然降低了。这是因为，虽然张雪峰提供信息服务，这一部分可以用一般商品的观点分析；但提供服务商品仅仅是其外表，内核则是信息商品垄断，并且已经与一般商品范畴之间出现了差别。为了理解这个“垄断”，我们需要从信息服务商品的特殊性质开始理解。一般商品在交易之前禁止非所有者使用，但是非所有者仍然拥有该商品的信息，他知道他在该商品的消费过程中能得到什么。比如购买大米之前就知道大米长什么样、一般的价格是多少、功用是可以用来填饱肚子。**信息服务商品则不然，它以购买者不知道它的具体内容、或只有很模糊的认知为前提。**而各种信息服务的提供者以及他们提供的信息商品之间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比如信息本身的差异、个人倾向的差异等。这些差异，再加上通过媒体形成的固定粉丝，信息所有者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垄断，这种垄断具有局部性与脆弱性。此外，虽然实际上应该很少有人找李火盆咨询后又找张雪峰咨询，但是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因为两者所提供的虽然是同类商品，但是并非同一商品，相互之间并不是完全可以相互替代。在每个信息服务者提供信息的独特性上，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垄断。在张雪峰引起的多起舆论冲突中，有一个导火索是张雪峰对文科的评价：他说文科都是“服务业”，要做的就是“爷我给你笑一个”。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其实是垄断者。**事实上，正是因为他是垄断者，他才会越来越“不客气”，出现怼家长的情况，使其形象管理越来越困难。**相反地，在一个某个行业的信息咨询企业中，每个企业提供的信息商品之间的同质性越强，其垄断性则越弱。

总结：我们需要的只是“真话”吗？

在有关张雪峰的讨论中，总有这样一种声音存在：认为封禁张雪峰是“不解决问题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仿佛张雪峰是多么正义、多么大公无私的一个人物。然而我们前文中可以发现，张雪峰是最功利主义的；如果不是自己对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十分认同，那么他大概也不会如此“真情流露”地贩卖这套观念。他“为底层学生着想”，但他想的是怎么把他们变成精英；与其说他想把底层学生变成精英，毋宁说他想借“变成精英”的空头支票敛财。他只是在经营一种商业模式，只是选择了为这套商业模式披上正义的外衣。

是的，张雪峰的言论及其价值观与统治阶级所想要宣扬的价值观有矛盾冲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的。首先，他的所作所为是引导无产阶级认同整套中产阶层的再生产方式，但是这个再生产的链条以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团结与相互竞争为前提，他们能爬上中产的位置，只是在无穷无尽的竞争中把其它无产阶级的弟兄踩了下去。一旦资本主义这艘船遇到了风浪，他们就会发现供他们活动的整个甲板都不够坚固。其次，张雪峰的所谓“真话”，从根本上也并未打破信息差。相反，正是因为信息所有者（如张雪峰）对信息的蓄意垄断，信息差才有存在的基础，信息所有者才能够借机敛财。

共产主义者批判张雪峰，但不是像《南方网》那样批判。一个张雪峰无法真正动摇“国家长远发展的人才根基”。如果这个黑锅真的要背到他的身上，那么要么是因

为他的势力已经大到可以扭转一个千万级别群体的整体方向，但如果是这样他就不会如此轻易就被封禁；要么是因为这个教育体制本身就有这种倾向，而张雪峰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教育被市场逻辑侵入，当所有学生都被当作商品来培养，当专业与个人发展脱离而与就业方向结合，中国就不能再奢求这个体系竟然能够“自然地”再生产出健康的人才结构。由于资本主义的产教融合方式，就业缺口极大的行业没人愿意选择；热门的专业却出现考生趋之若鹜的现象，结果劳动力严重过剩。虽然据称很大一批人在毕业较多年后会从事与本专业无关的工作，但是这恰恰证明，整个一套知识分工 - 就业的体系，是远远没有现代教育的辩护士宣称的那样成功的。强基计划就是一个例子，由本来“寻找基础性人才”的愿景变成了无限内卷的新战场。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知识的普及，脑力劳动任务的绝大部分逐渐转给了无产阶级，整套知识分工体系也随之发展起来。于是，在各个行业内部的盛衰周期之外又产生的新的周期，即大学生填报专业产生的周期。不同专业之间存在的壁垒使得它们毕业生的就业环境、平均薪酬很不一样，这就催生了一种幻想，仿佛我只要选一个就业会很好的专业，人生就能“万事大吉”。但是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这只是一厢情愿。一旦预期的好行业行情变化，那么四年前的全部选择都变成了错误。资本的流动不会等待在校的大学生，苛刻的老板不会可怜失业的毕业生。

因此，即使投入再多的精力用于“填报专业”，总是会有不可避免的失业；失业者的增多又进一步加剧文凭游戏的残酷性。我们遇到的是结构性的困境，社会将如此多的精力放到如何调整内部的就业分配上面，只能说明它的无能。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句“真话”来“指点迷津”，因为再怎么指点，我们仍然只会留在迷宫内部。我们需要的是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我们需要逐步消灭知识分工的历史状态，消灭资本主义式的产学融合，让专业直接与生产领域对接，把所有大学生以及学术资源都用一个统一的社会意志去整合、调配，这样才不会有大学生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才不会有张雪峰这类人存在的土壤。**

所谓“极权主义”的神话

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统治不仅依赖暴力，更通过精神生产资料塑造文化霸权，将剥削关系自然化为“常识”。家庭、学校、媒体、宗教、行会等非国家机构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统治秩序，使权力结构得以延续。文化霸权是制度、意识形态、实践与知识分子共同作用的复杂整体，其统一性在于服务于特定阶级的扩张。精神生产资料是力量关系的物质凝结，将其在社会积累的力量转化为国家权力。精神生产资料的演变始终与生产方式变革相伴，旧秩序衰落时，新的抗争空间得以出现。所谓“自由意志”在结构性强制下只是幻觉，工人“自愿”加班、农奴服从领主，皆因生存被捆绑于剥削关系。国家通过垄断暴力与提供基本保障，使人们在“绝对自由”与“有保障的生存”之间必然选择后者。最终，无论是父权执行者、殖民帮凶还是现代监工，他们的行为都深陷于生产关系与文化霸权之中，所谓自由意志在强大的结构性暴力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在这种意义上，出现了一种所谓“极权主义”的神话，它假设国家或统治阶级能够彻底消灭社会的裂隙，实现对个体思想与行为的全面掌控。它描绘了一幅恐怖的图景：一个全能的国家机器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毛孔，使所有个体都沦为国家意志的被动执行者。然而，正如葛兰西所揭示的，霸权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的静态统治，而是一个充满矛盾、不断受到挑战、必须持续再生产的动态过程。

在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

葛兰西在其政治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贡献，是明确区分了“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这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领域。前者指的是国家机器本身，包括政府、军队、警察、法庭等直接行使强制力的机构；后者则涵盖教会、学校、工会、媒体、家庭以及各种文化组织等构成社会生活肌理的空间（即精神生产资料）。任何稳定的统治都不可能仅仅依赖政治社会的强制力，而必须同时在市民社会中建立起一种文化霸权。然而，即便是被视为“极权”基础的政治社会，其强制力的施展也远非无限，而是受到深刻的物质性限制。

首先是**资源的有限性**。一个旨在实现全面监控、无死角镇压的全能国家，需要投入天文数字般的人力、财力和技术资源。国家的暴力机器与庞大的官僚系统，其运作本身就是巨大的消耗。要维系一个覆盖全体国民的监视网络，处理海量的信息，并对任何异议进行迅速的物理清除，其成本将迅速超出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承载能力。这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挤压生产与民生空间，更会使系统本身陷入信息过载与管理混乱的状态。历史上东德安全部（斯塔西）的档案便是一个绝佳

例证。尽管其情报网络极其庞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由于信息量过于庞杂、管理低效，最终反而使其无法实现理论上设想的全能控制，许多关键信息被淹没在无尽的官僚程序和数据噪音之中。

其次是**执行者本身也是人**。国家的强制力最终需要通过具体的人来执行，因此官僚、警察、特务、士兵并非抽象的机器齿轮，而是有情感、有私利、有道德感、有认知局限的个体。他们可能会因为惰性而敷衍了事，因为私利而选择性执行命令，因为基本的同情心或道德感而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或者在层级传递中曲解、篡改政策，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普遍局面。这种无处不在的“个例”的因素，使得国家意志在从顶层到基层落实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稀释、扭曲和变形。统治者或许可以颁布最严酷的法令，但无法保证每一位执行者都以同样的狂热与效率去贯彻它。这种“裂隙”是任何制度设计都无法完全弥合的。

法西斯主义的历史经验，常被误认为是“极权主义”的典范，但深入分析便会发现，它的统治恰恰证明了**国家控制存在肉眼可见的边界**。法西斯并非凭空创造出服从，而是利用并操控了社会中既有的不满情绪（经济危机、民族屈辱）造成“自下而上”的狂热，它的上台也非常依赖于与统治阶级（容克地主、垄断资本、教会）达成的脆弱同盟，而这些集团始终保留着独立的资源与影响力，纳粹党无法完全消化它们；它的合法性也始终处于焦虑之中，高度依赖领袖个人魅力、外部敌人的塑造以及持续的暴力表演。这种种现象都反证了其意识形态的内在虚弱——它无法真正赢得社会的同意，同时法西斯主义也正是无法取得同意的结果，因此它只能通过恐惧、动员与表演来维持表面的稳定。

现代信息技术的引入也并未消除这些限制，反而带来了新的矛盾。大数据、人工智能、面部识别等技术看似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监控能力，但这种增强是片面的。一方面，这些高科技系统依赖于脆弱的物理基础设施，如电力和网络，一旦遭遇破坏便会瞬间瘫痪。另一方面，这些技术会产生海量的“噪音数据”，**有效的分析依然高度依赖人力判断，从而再次引入了主观性与误差**。更重要的是，技术的升级往往会激发更精妙的抵抗技术。控制与反控制之间始终形成一种动态的博弈，例如加密通信、去中心化网络、反侦察文化等，都在与国家监控技术进行着持续的“军备竞赛”。技术非但没有终结这场斗争，反而将其带入了更复杂的维度。

因此，单从物质层面来看，政治社会这台“强制机器”就远非全能。

如果说政治社会的强制力存在物理边界，那么在市民社会中，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的争夺则构成了另一条永不闭合的战线。葛兰西强调，**霸权之所以需要不断再生产，正是因为它永远无法彻底征服人们的意识。市民社会中始终存在着霸权的裂隙与抵抗的土壤。**

人们的意识并非一张白纸，而是由多种来源构成的“自相矛盾的常识”的堆积场。其中，**个人的直接生活经验是颠覆官方叙事最强大的力量**。当人们亲身经历剥削、目睹腐败、感受到官方宣传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时，怀疑与不满便会自然滋生。无论宣传机器如何将贫困描绘成个人奋斗的不足，失业者切身的饥饿感是无法被抹除的；无论国家如何美化暴力，受害者身体的伤痛是真实存在的。这种源于感

官与日常的体验，构成了对抗意识形态灌输的坚实基础。

可见，人并非只是精神生产资料所灌输的意识形态的被动执行者，随着客观物质环境的变动，原本作为“被动的臣民”的主体也可能会变得“桀骜不驯”，从而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精神生产资料的掌控与争夺始终呈现动态博弈的特征。这种动态性体现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集团对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反复拉锯中。统治阶级中的思想家们（也就是反映在文化上的统治阶级）通过控制这些机构来巩固整个阶级的文化霸权，但被统治群体则可能利用同一套机制进行抵抗或重构。这种争夺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呈现多重主体参与的复杂博弈。**历史经验也表明，精神生产资料的争夺存在周期性规律。当物质生产领域发生重大变革时，其配套的精神生产资料的控制效能会逐渐减弱。**19世纪英国宪章运动期间，工人阶级通过自办报刊、机械学院和合作社，构建起平行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抗争空间。20世纪30年代美国工会组织利用工人广播节目和工人戏剧，成功短暂地突破了资本家对传统媒体的垄断。这些斗争都发生在旧生产关系难以维系的历史节点，印证了精神生产资料变革与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层关联。

同时，历史传统的残余是重要的意识资源。**任何社会都非凭空建立，而是承载着漫长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积淀。前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宗教信仰、伦理观念、社群互助精神，例如基督教的博爱理念、孟子的民本思想、乡土社会的互助习俗，都可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被重新激活并被改造，转化为批判现实的思想武器。**统治者无法彻底清洗历史，它们甚至也得通过这些传统才能维持合法性，或是从这些传统中找到维持统治的方法，这些“残余”便如同深埋地下的种子，随时可能在适宜的条件下破土而出，为反抗提供思想弹药与道德合法性。

此外，外部思想的渗透在全球化条件下几乎无法阻断。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宗教复兴、女权主义等多元思潮，通过网络、跨境交流、学术翻译、地下出版物等各种或明或暗的渠道持续输入，不断挑战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任何试图建立思想铁幕的努力，在信息时代都注定是徒劳的。

正是在市民社会的学校、媒体、家庭、文化场所中，围绕着“意义”的解释权，一场永不终结的“阵地战”反复上演。没有任何统治者能够永久占领所有的“阵地”，**官方意识形态本身为了安抚不同社会群体，也往往包含着内在的矛盾。例如，纳粹既鼓吹“民族共同体”的无私团结，又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极端个人竞争，这种自相矛盾的元素为批判者提供了绝佳的突破口。**与此同时，底层“理性”的觉醒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即便在最严密的宣传体系下，个体基于经验，计算自己的利害得失以及进行道德判断，也无法被彻底扼杀。当体制明显损害其生存利益或违背基本伦理底线时，沉默的顺从就可能转化为公开的抵抗。

这些抵抗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上，更生动地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霸权的动态性在学校、家庭、职场等空间的日常互动中表现得尤为清晰。我们常可以在生活中看到“无事生非的敌视”：**即使管理方（如老师、家长、经理、老板等）没有明显的过失，被管理方（学生、儿女、员工等）也会通过幽默、讽刺、挑刺、阳奉阴违等方式制造“象征性的对抗”，以维持心理上的主体性。**这种行为并不必然旨在推翻权威，而是通过“消解权威的神圣性”，来让权力关系显得可商量、可质疑、

甚至可笑。这是一种低风险但持续不断的日常抵抗，它不在正面战场上挑战统治，却在潜移默化中如水滴石穿般削弱了霸权的绝对性。

这种看似“无事生非的敌视”，并非单纯的情绪发泄，而是文化霸权被持续挑战的具体表现。学校、家庭、职场等空间，实际上都是“局部霸权”的运作场所。在这些场所中，老师、家长、经理等权威角色不仅制定规则，更在塑造着“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正常的”这种日常常识。被管理者即便表面上承认这些规则的必要性，也必然会本能地认识到这是外部强加的秩序，与自身的生活经验或内在价值观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往往通过细节爆发出来，比如抓住管理方的口误、模仿其滑稽的穿着、嘲笑其不合时宜的习惯。这正是一种对权力不平衡的微型抵抗与矫正。

在这些关系中，总有人会不自觉地扮演“日常抵抗的发声者”的角色。比如班级里那个总爱带头吐槽老师的学生，办公室里那个善于暗中调侃老板的同事。他们通过语言、笑话、表情包、暗号等方式，将零散的个体不满转化为一种共享的“亚文化”，形成对主流话语的小规模对冲。虽然这种反霸权话语未必能立即改变结构，但它能在群体内部制造凝聚力，让被管理者感到“我们在一起，我们都懂”。**这种凝聚力本身就是对霸权合法性的侵蚀，因为它生动地表明，统治阶级的“常识”从未被完全、无条件地接受。**

更重要的是，即使管理方行为温和，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本身就会让被管理者感到身份上的不平等。霸权的合法性需要被管理者的“自愿同意”，但这种同意从来不是全然的，它总是伴随着潜在的怀疑与抵触。这种不平等感会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被放大、戏谑化，从而形成一种“象征性平衡”——既不直接挑战权威以至于招来惩罚，又不完全臣服以至于丧失自我。正是在这种无处不在的微观抵抗与张力中，我们看到“极权主义”的神话被不断地从内部瓦解。因为如果一个真正“极权”的社会存在，那么这些象征性的裂隙、这些心照不宣的嘲讽、这些亚文化的萌芽，都将不可能出现。

由此可见，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警示的现代社会走向“一体化”的危险倾向，还是人们对“极权主义”国家的想象，如果用葛兰西的视角审视，都会发现它们描述的并非一个已然实现或可能实现的“极权”状态，而是霸权不断扩张、斗争日益激化的过程，而**霸权的扩张，永远伴随着裂隙与抵抗**。所谓“极权主义”的神话，正是忽视了这些现实的物质成本与思想文化领域的不可控性，它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单向的国家意志投射，掩盖了统治与被统治之间持续的互动、博弈与裂缝。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叙事，而非对现实政治形态的准确描述。这种神话的危险之处，不仅在于它误导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更在于它掩盖了现实中真正的斗争场域，让我们误以为反抗是无望的。

自由主义者的恫吓

正是在这种“反抗无望”的叙事阴影下，另一种论调常常浮现：既然群众在日常中表现出零散、自利甚至愚钝的行动，那么他们便无法自觉追求集体利益，必须依靠某种外在的独裁力量来强制实现所谓“人类整体的利益”。这种论调与“极权主义神话”如出一辙，它们都把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单向的意志投射，只不过前者是

国家机器的全能，后者是独裁者的全能。二者共同的逻辑错误，在于把个人动机视为一切，仿佛历史只是无数“自私个体”的算计叠加。

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忽视了外部环境与社会关系对个体行为的结构性塑造。个体的确可能在稳定时期表现为局部的自利，但当危机条件加剧（如经济崩溃、失业潮、战争、国家暴力的泛滥），分散行动的效用会迅速下降，集体行动的效用则会显著上升。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个体即便出于最低限度的自利，也会被迫走向集体化的实践**。葡萄牙1974年的“康乃馨革命”便是典型例证：工厂与军营中自发形成的委员会，并非源于抽象的理想主义，而是危机条件下个体“自救”逻辑的必然结果。同样，在21世纪的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都显示出当资本主义矛盾集中爆发时，原本分散的个体诉求会迅速汇聚为跨群体的集体行动。

这正揭示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辩证逻辑。整体不仅是个体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三种功能超越个体：其一是协调功能，将分散的行动整合为有序的联合作用；其二是保障功能，通过制度化的互助与规则降低个体风险；其三是意义生产功能，以共享叙事与共同目标赋予个体行动以历史合法性。个体在整体中获得风险分担、制度性保障与历史意义，因此即便出于自利动机，也会在实践中表现为“奉献”与“理想主义”。这并非群众突然变得“高尚”，而是**外部环境与整体功能共同作用的结果**。

更进一步，阶级斗争的过程本身就是群众的自我教育。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已指出，工人阶级在斗争中不仅争取工资与工时，更在斗争中学会组织、学会团结、学会超越个人利益而追求集体解放。正是在这种实践中，群众逐渐由“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在这一过程中，革命党的作用不可或缺：它集中经验，提供战略，协调分散的斗争，使整体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群众的自发性与党的组织性并非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改良主义批判

中国现存的改良主义思潮产生的土壤

当代的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以专制主义国家机器为支撑，官僚阶层与资产阶级结成稳固的同盟，共同维护资本积累与统治秩序。表面上，这个国家以“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名义自居，实际上却是是资本增值与阶级压迫的工具。中国国家的本质并非超越阶级的“中立仲裁者”，而是资本主义统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权力表面上超越阶级对立，以“人民利益”的名义维持统治，实则在压制社会矛盾的同时为资本增值提供制度保障。国家既是资本主义的守护者，又以强力机器的姿态凌驾于社会之上。**这种双重性，使得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虽然频繁，并能迫使中国大陆的资产阶级只能靠专制制度维持其统治，却始终难以突破分散状态，无法直接撼动国家机器。**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改良主义思潮有了滋生的土壤。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与看似牢固的统治秩序，一部分人开始怀疑暴力革命的可能性，转而寄希望于制度内的渐进改良；另一部分人则干脆承认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把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当作最终目标；还有人把改良主义视为“阶段性策略”，认为只有等到阶级斗争形式发生质变时，才有可能谈论革命。

中国现存的各派改良主义思潮

一部分人认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机器过于强大，暴力革命不可能被组织起来，因此只能通过渐进的改良来改善劳工处境，乃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种观点可以被称为“进化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强调历史的渐进性，认为社会可以通过不断的制度改良与政策调整逐步走向社会主义。这种观点往往引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新需求，导致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的论述，却有意忽略了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斗争的普遍性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它把历史的辩证运动简化为线性演进，把阶级斗争替换为单纯的“制度优化”，最终沦为一种不可实现的空中楼阁。

另一部分人则更为彻底地抛弃了革命，抛弃了共产主义，直接认为资本主义本身没有根本问题，只需在其框架内不断完善社会福利与民主制度即可，这就是“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思潮不再以共产主义为目标，而是直接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认为只要通过福利国家、议会民主与社会保障，就能实现社会公正。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认为，现代的“新”资本主义通过技术革新、全球化分工与资本积累，使得它仍然能够不断创造新的财富与物质条件，使社会整体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其次，资本

主义国家在一定阶段通过福利政策、社会保障与工资提升，对工人阶级进行“收买”。这种收买并非消灭剥削，而是以部分让渡来换取工人的顺从，使他们在不进行激烈斗争的情况下也能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于是就可以让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被消费主义与福利幻象所笼罩。于是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便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可以自我调节、不断改良，从而实现社会公正与稳定。

这种观点在二战后和苏联解体后的“资本主义繁荣时期”曾经盛行。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战后重建、技术革新与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秩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福利国家的扩张、社会保障的建立以及工人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许多人相信资本主义能够通过制度内的改良实现“全民共享”的进步。然而，这些繁荣时期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劳累过度与过度剥削的现象比比皆是。

在美国，战后“繁荣”并未消除工人斗争。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钢铁、汽车、运输等行业的罢工频繁发生。1970年，美国邮政工人大罢工席卷全国，涉及20多万工人，迫使政府妥协。与此同时，美国工人长期处于高强度劳动环境中。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1970年代制造业工人平均每周工时超过40小时，加班普遍存在；在西欧，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中超过千万工人罢工，意大利1969年“热秋”工潮要求缩短工时、提高工资，英国1978到1979年的“冬日不满”则是工人对长期压榨的集中反抗；在日本，高速增长期的“过劳死”成为国际通用词汇。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1980年代起每年都有数百起因过度加班导致的猝死案例，说明所谓“日本奇迹”的背后是工人生命健康的牺牲；在韩国，1987年全国性大罢工动员数百万工人，要求民主权利与劳动保障。即便在今天，韩国仍以“长工时社会”著称，OECD数据显示其工人年均劳动时长长期位居发达国家前列。2024年京畿道华城电池厂火灾造成2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外籍工人，这暴露了工人们在“3D工种”（脏、累、险）中的极端剥削；在中国，2015年全国至少发生2700起工人集体行动，涵盖工资拖欠、工伤赔偿、社保权益等问题。近年来程序员、二次元汉化组成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兴工人群体的抗议不断出现，说明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并未消除矛盾，反而加剧了剥削和压迫。

这些事实表明，所谓“繁荣”并非阶级矛盾的消失，而是统治阶级在工人运动压力下的暂时妥协。福利制度与工资提升是资本主义为了维持统治所作的让渡，而非制度本身的仁慈。更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从未被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彻底消灭。消费主义、民族主义、个人奋斗叙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工人，但每一次罢工、抗议、集体行动，都是工人阶级在斗争中重新认识自身处境、形成阶级意识的过程。

因此，无论在生产关系、政治领域还是思想文化领域，阶级斗争都从未停歇。社会民主主义所谓“资本主义没有问题”的立场，正是对这些持续不断的斗争现实的遮蔽与否认。

还有一些人采取折衷立场，认为改良主义道路只是“权宜之计”，在现阶段只能通过NGO、法律援助等方式积累力量，待到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或者阶级斗争形式发生质变——即目前分散的、每年数万次的自发工人斗争转化为能够直接瘫痪国家机器的力量——才开始建设列宁式政党领导革命。这种观点可以称为“改良阶段主义”。“改良阶段主义”看似比前两者更“革命”，因为它承认未来需要建立列宁式政党并进行革命。但它的问题在于，把革命无限推迟到某个“未来时刻”，而在现实

中却完全沉溺于改良主义的实践。它把 NGO、法律援助、劳工维权等工作视为“阶段性任务”，却不把这些斗争纳入到革命党建的整体战略中。**结果就是，等到阶级斗争形式真正发生质变时，革命党却并不存在，群众的自发斗争缺乏集中领导，最终只能被国家机器镇压或被资产阶级势力收编。**

因此，这三种改良主义虽然有差异，但它们殊途同归。它们都否定了建立列宁式工人革命党的现实性与紧迫性，最终滑向取消主义与尾巴主义。取消主义意味着放弃革命目标，尾巴主义则意味着在现实斗争中丧失独立性，只是跟随自发运动或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尾巴。

列宁式革命党必须进行改良斗争

然而，**批判改良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改良斗争本身。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楚地区分二者。**改良主义是一种政治立场，它把改良当作最终目标，否定革命。而改良斗争则是工人阶级在现实条件下不可避免的斗争形式，是阶级力量积累与群众觉悟提高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工人阶级每天都在进行各种形式的改良斗争：工资讨要、工伤赔偿、反对超时加班、争取社会保障。这些斗争虽然是局部的、分散的，但它们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共产主义者必须深入其中，推动这些斗争的发展，把它们与更广阔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进行改良斗争，而在于如何进行。**改良斗争要在工人日常生活的矛盾中找到切入点。比如在工厂里，工人们最直接的要求往往是工资、工时和安全保障。共产主义者必须帮助工人把这些零散的诉求组织起来，从个别的讨薪行动发展为集体的谈判与罢工，使工人认识到他们的力量只有在团结中才能发挥作用。这样的斗争不仅能争取到眼前的利益，更能让工人亲身体会到阶级对抗的现实。事实上，改良斗争可以说是提升工人阶级意识的唯一现实途径。即使这种斗争并非在党直接领导下展开，它依然在客观上推动了工人对自身处境的觉醒。因为**阶级意识并不是先验的灌输，而是在斗争中不断生成和深化的。**改良斗争与阶级意识的形成存在辩证关系：没有斗争，意识就会停滞；而在斗争中，意识才能突破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束缚，逐步走向觉醒。

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工人维权往往受到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渠道毫无意义。相反，利用法律援助、媒体曝光等方式，可以扩大斗争的影响力，迫使资本家和地方政府做出让步。**然而，共产主义者必须始终提醒群众：这些让步是暂时的，是在压力之下的妥协，而不是制度的恩赐。只有不断地斗争，才能迫使统治阶级退让。**

同时，改良斗争还必须与宣传教育结合。每一次工人集体行动，都是向群众揭示资本主义本质的课堂。通过传单、讨论会、工人互助网络等形式，把个别斗争与整个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让工人明白，他们面对的不是某个“坏老板”，而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改良斗争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它本身能否彻底改变社会，而在于它能否成为阶级教育和组织的过程。只有这样，改良斗争才能超越改良主义的局限，成为革命党建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在阶级斗争形式发生质变时，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群众性革命党，那么指望在那个时候临时建党是根本不可能的。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革命的爆发往往是突然的、迅速的，而革命党的建设则是长期的、艰苦的。如果没有事先的准备，革命高潮只会被浪费，最终导致失败。1953年东德工人起义，数十万工人走上街头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和政治自由，却因没有革命党来集中力量，最终被苏军和东德警察镇压；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也是典型例子，学生和工人自发组成工人委员会，短时间内几乎推翻了苏联扶植的政权，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革命党领导，运动很快被苏军血腥镇压；同样，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捷克斯洛伐克掀起了广泛的民主化与社会主义改革浪潮，却因缺乏能够在群众与国家机器之间形成坚实组织的革命党，而在华约的坦克开入布拉格时迅速崩溃。相比之下，1974年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虽然推翻了独裁，但由于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缺乏统一的革命党领导，最终被社会民主化和议会体制所吸收，未能完成深刻的社会改造。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和1969年意大利的“热秋”工人斗争，虽然一度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危机，但由于共产党与工会的保守立场以及缺乏革命党在群众中的领导，最终都被体制所化解。1980年代的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Intifada）展现了群众的巨大能量，但因缺乏统一的革命纲领和党组织，运动逐渐被民族主义与宗派政治所分割。甚至在当下，2025年孟加拉国与尼泊尔的工人运动也显示出类似的矛盾：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不断爆发，却因缺乏一个成熟的群众性革命党来集中力量、制定战略，而面临被国家机器镇压或被改良主义力量收编的危险。所有上述事实都表明，**革命高潮的突然性与革命党建设的长期性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如果没有事先准备，群众的英勇斗争往往只能化为历史当中的悲壮插曲，而无法转化为真正的社会解放。**

因此，中国现在必须着手建设一个列宁式的革命党。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民主集中制，保持与工人阶级的紧密联系。改良斗争将是这个党现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但绝不是它的全部任务。党的根本任务是通过改良斗争积累力量、锻炼干部、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为未来的革命高潮做好准备。

如何让改良斗争、思想文化斗争和武装斗争统一起来？

民主集中制不仅仅是一个组织原则，更是一种工作原则。它既要求党在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讨论，让不同经验、不同岗位的同志能够畅所欲言，提出各自的见解；又要求在形成统一决议后，全党在行动上保持高度集中，步调一致。这种原则的意义在于，它避免了组织陷入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也防止了少数人专断的官僚化倾向。只有在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条件下，党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既能吸收群众的智慧，又能在关键时刻形成统一的意志。

这也意味着，党的工作不能局限在某一个方面，而必须在统一领导下开展多方面的实践。如果一个组织只干发行报纸和杂志的工作，那么它就会陷入知识分子的狂欢的境地，把革命简化为“思想的传播”，最终脱离群众的实际斗争；如果一个组织只干 NGO 和法律援助的工作，那么它就会陷入改良主义，把有限的维权当作全部事业，丧失革命方向。**真正的革命党必须吸收来自不同行业、具有不同才能的人，在统一领导下各尽所能，同时推进宣传、组织、法律援助、工会建设、理论研究、文化工作乃至国际联络等多方面的工作。**只有这样，党才能在长期的斗争中积累力量，形成真正的群众性革命力量。

这种全面性并不是形式上的“面面俱到”，而是源于阶级斗争的现实需要。工人阶级的斗争是多层面的：有经济上的罢工与维权，有政治上的抗议与组织建设，也有思想文化上的对抗与教育。**党必须在这些领域同时发挥作用，才能把零散的斗争汇聚为整体的阶级力量。任何片面的做法，都会导致党在某一方面畸形发展，而在整体上失去领导力。**

因此，批判改良主义并不是否定改良斗争，而是要揭示改良主义的局限性。改良主义把改良当作最终目标，否认革命的必要性；而共产主义者必须把改良斗争作为阶级教育和组织的手段，把它纳入革命党建的长期战略。只有在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下，党才能避免宣传主义的空洞化和改良主义的尾巴化，真正把群众的日常斗争转化为阶级觉悟的提升和革命力量的积累。改良主义的各种变体——无论是进化论式的幻想、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还是阶段主义的拖延——最终都走向取消主义和尾巴主义。而唯有在革命党的领导下，改良斗争才能超越自身的局限，成为通向工人阶级解放的阶梯。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在当下的讨论里，人们往往把“法西斯”简单地等同于“专制”，好像只要存在独裁、压迫，就可以直接贴上这个标签。但历史事实恰恰提醒我们，专制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独有属性。殖民地政府长期依靠暴力统治和种族隔离来维持秩序，却并不因此就等同于法西斯；波拿巴主义的国家机器同样表现为强人独裁和议会空壳化，但它的阶级基础和政治逻辑与二十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并不相同。如果忽视这些差别，只是把一切形式的专制都混同为“法西斯”，就会模糊真正的历史特征。更有甚者，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常常把“法西斯”当作辱骂对手的口头禅，而不是作为一个需要严肃分析的历史范畴。这种做法不仅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也让我们在面对现实危险时失去了科学的判断力。

显而易见的是，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一个已经彻底消失的历史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极少有政治力量公开自称“法西斯”，但各种“新法西斯主义”“新纳粹”运动依然在不同国家出现：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在经济危机和移民问题中不断壮大，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借用纳粹符号和口号，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也出现过借鉴法西斯式组织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这些事实表明，对于现代来说，法西斯主义仍然是一种在资本主义危机和社会矛盾激化时可能反复出现的危险。

在中国的语境中，虽然没有出现过可以严格称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现实政治力量，但自2001年以来，网络空间中确实出现了带有“法西斯化”倾向的民粹主义现象。无论是“红客”在中美撞机事件后的网络攻击，还是“帝吧出征”“饭圈出征”等集体行动，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敌我对立的二元划分，以及群体性的情绪化动员。这些现象本身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法西斯主义（甚至离法西斯还远得很），但它们提醒我们：在社会矛盾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统治阶级感到危机的条件下，这种民粹主义完全可能被改造和利用，演化为真正的法西斯运动。换句话说，中国的民粹主义并不是法西斯主义，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土壤。

正因为如此，**重新认识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概念澄清，而是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只有把握它的历史特征、阶级基础和具体表现，我们才能避免把它庸俗化为抽象的专制或随意的辱骂标签。更重要的是，唯有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才能识别出当代社会中可能孕育法西斯主义的土壤，防止它在危机中再次崛起。换句话说，理解法西斯主义的真正含义，并不是为了停留在理论上的争论，而是为了更好地反对它，捍卫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解放斗争，避免让社会主义革命演变成

法西斯的反革命。

“法西斯”一词的历史

“法西斯”一词的最早来源是古罗马的 *fascēs*。这是一捆木棒，中间插着一把斧头，由执政官的侍从举在手中，象征着国家的权威，同时也象征着团结：单根木棒容易折断，但捆在一起就坚不可摧；斧头则象征着国家对生命的裁决权。这个符号在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期广泛使用，代表着国家机器的力量。它并不是一个政党或运动，而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正因如此，后来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在寻找历史符号时，重新拾起了这个古老的象征，把它作为国家统一与权威的标志。

然而，“*fascio*”在意大利语中的含义并不仅仅是古罗马的遗产。在十九世纪末，意大利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动荡：统一后的国家软弱无力，南北差距严重，南部农民长期处于半封建的农奴制度下，生活困苦，而北方的工业化则催生了新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迅速传播。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的“*fasci*”——意大利语中意为“联盟”或“团体”。

这些 *fasci* 并不是右翼或反动的组织，而是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自发联合，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 1891 年到 1894 年的“西西里联盟”（*Fasci Siciliani*）。这一群众运动在短短几年间迅速扩展，全岛已有近 200 个 *fasci*，成员超过 20 万人，他们要求土地改革、缩短工时、提高工资、减轻税负，并组织罢工和示威，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色彩，甚至与当时的意大利社会党有密切联系。正因如此，政府和封建主阶级对其极为恐惧，1894 年时任总理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派遣军队血腥镇压，宣布戒严，逮捕数千人，许多领导人被判处长期徒刑，运动被迫解散。由此可见，19 世纪末的 *fasci* 运动虽然短暂，却代表了意大利工农群众的自发斗争，是左翼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它表明“*fascio*”一词在当时的语境中并不意味着反动或专制，而是群众性的、进步的、甚至是革命性的。换句话说，后来所谓的“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通过对这一已有词汇和符号的重新挪用才获得了新的含义。墨索里尼之所以能够在 1919 年成立“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Fasci italiani di combattimento*），正是借用了这一历史词汇，把它从左翼群众运动的语境中抽离出来，重新赋予极右翼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成为法西斯主义创始人的墨索里尼，早年正是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人物。墨索里尼出生于 1883 年，他的父亲是一名铁匠，同时也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他影响很大。墨索里尼青年时期曾在瑞士流亡，参与工人运动，担任工会秘书，并为社会主义报刊撰稿。他在 1900 年代加入意大利社会党，成为激进派的代表。

1912 年，他被任命为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Avanti!*）的主编，迅速崭露头角。他猛烈抨击改良主义，主张阶级斗争，甚至因激进立场而被誉为“革命左派的明星”。这一时期的墨索里尼，毫无疑问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一切。1914 年，墨索里尼最初反对战争，呼吁中立，但很快转向支持意大利参战，认为战争可以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这一立场与社会党多数派相冲突，他因

此被开除出党。此后，他创办《意大利人民报》，逐渐转向民族主义，最终走上了与社会主义决裂的道路。

在墨索里尼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诗人、剧作家、民族主义者加布里埃尔·邓南遮。邓南遮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和美学家。他强调英雄主义、暴力、激情和群众动员的美学，对后来法西斯主义的象征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1919年，邓南遮发动了著名的“菲乌梅进军”（March on Fiume），率领退伍军人和民族主义者占领了亚得里亚海港口城市菲乌梅（今克罗地亚里耶卡）。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短暂的“摄政国”，实行准军事化统治，推行极端民族主义政策，并通过演讲、仪式、符号和群众动员来维持权威。这一实验虽然短命，但为墨索里尼提供了重要的灵感。墨索里尼后来在“向罗马进军”中借鉴了邓南遮的手法：利用退伍军人、准军事组织、象征符号（黑衫、敬礼、旗帜）、群众集会和暴力动员，制造政治压力，迫使国王任命自己为首相。可以说，邓南遮的“群众美学”和政治实验，是法西斯主义形成的重要文化源泉。

1919年，墨索里尼成立“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Fasci italiani di combattimento），成员主要是退伍军人、小资产阶级青年和民族主义者。他们的目标不是土地改革或争取工人权利，而是打击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维护资本主义秩序。他们身穿黑衫，手持棍棒，纵火、殴打、暗杀工人领袖，摧毁合作社和报纸。这种暴力运动得到了地主、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默许与支持。1922年，墨索里尼发动“向罗马进军”，在国王的妥协下上台执政。此后，“法西斯”一词彻底被歪曲，从19世纪末的左翼群众运动，变成了后世最能表达“极右翼”这一概念的词汇。

作为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的兴起往往与一次失败的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相连。换句话说，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在革命危机中抛弃民主外衣、转向公开恐怖的产物。只有当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而又未能成功夺取政权时，统治阶级才会选择扶植法西斯势力来镇压革命。值得注意的是，前一个条件，正是我们工人群众要创造的现实，这意味着法西斯就像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子那样不能够不警惕。

1919年1月，德国共产党发动了“斯巴达克起义”，试图将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阶段，但被社会民主党右翼艾伯特政府联合自由军团血腥镇压，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杀害，德国革命遭受重创；1920年，意大利爆发了大规模的工厂占领运动（“红色两年”），金属工人占领了北方的工厂，农业工人、小农和农奴也在南方反抗大地主。这场运动一度具有革命潜力，但社会党领导层缺乏革命决心，改革派害怕革命失控，将斗争限制在经济领域，最终与资产阶级达成妥协。结果，工人运动失败，工人阶级士气低落，许多人脱离党派和工会。正是在这种挫败感中，墨索里尼的黑衫军得以迅速壮大；日本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1920-1921年“大正民主”时期，日本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者片山潜等人组织了劳工

运动，但随着 1925 年《治安维持法》的颁布，左翼力量遭到严重打压。1928 年“三一五事件”中，大批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被逮捕，日本工人运动陷入低潮。此后，财阀与军部逐渐结成同盟，最终在 1930 年代走向军国主义。

这些例子表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威胁的应激反应。当工人阶级的革命未能成功，资产阶级便会选择支持法西斯势力，以公开恐怖的方式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在于通过国家统制经济强化垄断资本，把传统专制机器与蛊惑性的群众动员结合起来，形成“自上而下的恐怖”与“自下而上的狂热”相互强化的独裁结构。与传统的专制不同，**法西斯主义并不仅仅依靠军队和警察的镇压，它主动煽动阶级仇恨与民族沙文主义，通过资产阶级资助的准军事组织和大众传媒，将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部分工人等群体异化为压迫自身阶级的暴力工具。**纳粹冲锋队、意大利黑衫军、日本的右翼结社，都是这种机制的典型体现。这种“群众反对群众”的机制，使**法西斯既能像传统专制一样镇压革命，又能以“人民意志”的名义粉饰暴政，这正是它与旧式独裁的本质差异。**

在法西斯主义政权建立之后，这些准军事组织并没有随着政权的稳定而消失，相反，它们被制度化、常态化，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意大利，黑衫军在 1923 年被正式改组为“国家安全志愿民兵”（MVSN），成为与正规军并行的武装力量，直接听命于墨索里尼和国家法西斯党。它不仅承担镇压罢工、打击反对派的任务，还被赋予象征性的政治功能，出现在各种群众集会和仪式中，以展示政权的力量。

在德国，纳粹冲锋队（SA）在希特勒上台前是街头斗殴的主力，1933 年后虽然在“长刀之夜”中遭到清洗，但党卫军（SS）迅速取而代之，成为更为精锐和残酷的准军事组织。SS 不仅是希特勒的私人武装，还控制了集中营系统，直接参与大规模屠杀和种族灭绝。与此同时，希特勒青年团等组织也被纳入国家体制，承担对青少年的军事化训练和意识形态灌输，使整个社会处于准军事化的氛围之中。

在日本，虽然没有像黑衫军或冲锋队那样统一的党派武装，但右翼结社、青年军官集团和秘密社团长期存在，并与军部保持密切联系。诸如“血盟团”“玄洋社”等组织在政权默许下进行暗杀、恐怖活动，而军部内部的青年军官则通过“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政变行动直接干预政治。与此同时，国家通过“青少年团”“大政翼赞会”等组织，将社会生活全面军事化，使准军事动员成为日常。

上述这种“群众的”准军事化的常态化，使得法西斯主义政权能够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渗透暴力与恐惧，从而维持其独裁统治。

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离不开大资本家的支持。在德国，工业资本家如古斯塔夫·克虏伯和弗里茨·蒂森，从 1930 年起就通过“工业家请愿书”推动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并为纳粹冲锋队提供资金支持。在意大利，法西斯党在 1919-1922 年的初期就得到了工业联合会和地主联盟的支持。1921 年，法西斯党获得 35 个议会席位，其中 70% 的竞选资金来自农业资本家。在日本，三井、三菱等财阀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逐渐转向支持军部。1932 年“血盟团事件”中，财阀代表被暗杀后，财阀与军部达成了所谓“军财抱合”的协议，形成了军国主义的基础。

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主要来自小资产阶级、失业工人和流氓无产阶级。在德国，1932年纳粹党的选民中，小业主和公务员占45%，失业工人占25%。在意大利，黑衫军成员中40%来自小农和城市小市民。在日本，1932年“五·一五事件”的参与者多为农村青年和底层军官。法西斯主义通过组织“民众集会”“青年团”等形式，把这些阶层包装成“革命主体”，利用他们对社会动荡的恐惧，诱导他们支持消灭工会、迫害左翼的政策。同时，法西斯主义也有限度地动员工人阶级。例如，德国在1933年成立“德国劳工阵线”，吸纳工人，但在同年5月摧毁了独立工会。意大利在1927年颁布《劳动宪章》，名义上保障工人福利，实际上是把工人组织纳入国家控制之下，禁止罢工和独立工会。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法西斯主义与波拿巴主义并不相同。波拿巴主义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在阶级力量僵持时，一个看似超阶级的强人政权依靠军队和官僚机器，以“全民代表”的姿态统治。它的特点是国家机器凌驾于社会之上，调和阶级矛盾，但并不依靠群众性的暴力运动来摧毁工人阶级。法西斯主义则不同，它不仅依靠国家机器，还依靠群众性的准军事组织和极端民族主义动员，主动摧毁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是资产阶级在革命危机中选择的公开恐怖统治形式。

在拉丁美洲，许多军人政权常被人称为“新法西斯政权”，但严格来说，它们更接近波拿巴主义。以阿根廷的庇隆主义为例，胡安·庇隆在1940年代提出“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的口号，主张“第三立场”，既反对自由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庇隆确实在意大利驻军时接触过法西斯主义，对其社团主义制度有所借鉴，他的政权也建立过准军事化组织，例如“铁卫队”，并利用这些组织在政治斗争中打击反对派。然而，庇隆主义并不是法西斯主义。首先，庇隆依靠的是资产阶级和工会的支持，他通过工会体系动员工人，推行社会福利政策，扩大工会会员数量，这与法西斯主义摧毁工人组织的做法完全不同。其次，**庇隆主义没有像意大利和德国那样建立一个以准军事暴力为核心的群众运动来摧毁左翼，而是通过国家与工会的联盟来维持统治。**因此，庇隆主义更接近波拿巴主义式的强人政权，而不是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制度

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极端专制的政权形式，本质上反映了垄断资产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的暂时力量平衡。这种平衡从一开始就带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阶级社会的矛盾无法通过恐怖统治被消除。相反，法西斯主义的统治方式往往加剧了阶级斗争，使得任何依靠暴力维持的平衡都显得脆弱不堪。专制程度越高，政权越依赖暴力来压制矛盾，但这种压制不仅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紧张关系，例如垄断资本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歧，也不断刺激底层的反抗。同时，法西斯主义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危机，如生产过剩和分配不公，反而通过战争和掠夺来延缓危机的爆发。这种统治逻辑决定了法西斯主义只能是短暂的历史现象，而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长期稳定的出路。

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建立后，提出了所谓的“法团国家”模式。所谓法团主义

(Corporatism)，是指将社会和经济生活组织成各种“法团”或“社团”，由国家承认的工会、雇主协会和职业团体共同参与决策，表面上是为了调和劳资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其核心是通过国家对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整合，形成一种“整体国家”的结构。这一思想最早源自天主教社会学派，强调阶级合作而非阶级斗争，本身并不等同于法西斯主义。理论上，**法团主义可以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出现，它强调的是一种社会组织模式，而不是必然的专制统治。**然而，在墨索里尼的实践中，法团主义被改造成了法西斯国家的制度外壳。1930年代，意大利建立了22个行业社团，每个社团都包括工人和资本家的代表，并在立法机构中拥有席位。墨索里尼宣称这种制度超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第三条道路”。但实际上，这些社团完全受国家控制，工人失去了独立组织的权利，罢工被禁止，工会被纳入国家机器。换句话说，法团主义在意大利并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模式存在，而是被法西斯主义利用和扭曲，成为掩盖对工人阶级全面镇压的工具。

在德国，纳粹政权并没有采用意大利式的法团主义，而是建立了更为彻底的国家统制经济。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立即解散了独立工会，成立了“德国劳工阵线”(DAF)，将工人完全纳入国家控制。纳粹政权通过“四年计划”来推动经济军事化，目标是为战争做准备。德国经济学家赫尔曼·戈林被任命为“四年计划总负责人”，他主导了钢铁、煤炭、化工等关键行业的扩张。纳粹政权大力发展军工产业，推动“自给自足”政策，试图减少对外依赖。这种统制经济在短期内确实刺激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失业率从1933年的600万下降到1939年的不足100万。但这种增长是以军事扩张为导向的，民生消费被压缩，资源被优先分配给军工。纳粹德国的经济模式本质上是为战争服务的，它通过掠夺被占领区的资源和奴役劳动力来维持运转。根据历史研究，二战期间德国使用了超过700万外国劳工和战俘作为强制劳动者，他们在矿山、工厂和农场中被迫劳动。

在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同样推行了国家统制经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渐走上全面战争的道路。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建立了“企画院”，负责经济统制和资源分配。日本的财阀集团，如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与财阀形成了所谓“军财抱合”的关系，军部为财阀提供订单和资源，财阀则为军部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日本的经济政策强调“国防国家”，大量资源被投入军工生产，民生消费被压缩。与此同时，日本在占领区实行掠夺政策，从中国、朝鲜和东南亚掠夺粮食、矿产和劳动力。根据研究，二战期间有数百万中国人和朝鲜人被强征为劳工，许多人在恶劣条件下死亡。这种以战争为中心的经济模式，虽然在短期内增强了军事实力，但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的正常发展。

从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可以看出，法西斯主义的经济体制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相同。**它们都试图通过国家干预来调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但这种干预并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是为了维持统治和发动战争。**意大利的法团主义看似强调“阶级合作”，实际上是剥夺工人权利；德国的统制经济在短期内创造了繁荣，但完全依赖军事扩张和掠夺；日本的军国主义经济则是财阀与军部的结合，牺牲民生来服务战争。这些模式都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和强制性，它们通过牺牲消费、透支未来资源和压榨劳动力来维持运转。这种资源配置模式本质上是反生产的，因为它不满足社会的正常需要，而是服务于政治和军事目标。

另外，我们要知道，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猛烈增长不断冲击着资本关系的局限。股份公司、国家接管铁路邮政等大规模交通工具，都是生产力社会化趋势的表现。但这种“社会化”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的框架，而是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中。国家的干预和所谓“计划”并不是对市场规律的替代，而是市场机制的补充。即便在军工和重工业领域，国家直接介入管理，技术研发和物资供应依然依赖私有企业的分包体系，钢铁、电子元件等基础物资仍通过市场采购。换句话说，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中依然起决定作用，国家的作用只是通过订单、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来引导资本流向，而不是消灭资本逐利的本性。

这一点在法西斯主义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纳粹德国的“四年计划”虽然建立了戈林康采恩这样的国家控制企业，但仍然依赖克虏伯、蒂森等私人垄断资本的生产体系。政府通过补贴和订单诱导合作，而不是剥夺产权。军国主义日本通过《国家总动员法》设立“统制会”，由三井、三菱等财阀高管主导资源分配，政府只是协调产能，私有产权和企业自主性依然存在。意大利的法团主义更是如此，所谓“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参与”的社团完全受国家控制，工人失去独立权利，但资本家依然在市场上逐利。由此可见，法西斯主义国家的“计划”本质上是战争动员的卡特化，是国家与垄断资本的暴力整合，而不是对价值规律的超越。正因为价值规律依然起决定作用，法西斯主义国家的统制经济必然充满矛盾。在私有制框架下，企业之间仍然会为争夺政府订单或逃避管制而展开竞争。纳粹德国在战争后期的军工生产就是典型例子。陆军、空军和党卫军各自支持不同的坦克型号，导致生产线混乱，资源浪费严重，无法形成规模效应。日本的情况也类似，不同财阀支持不同的军工体系，造成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这些矛盾说明，国家的“计划”无法消除资本逐利的本性，反而在战争动员的压力下加剧了资源争夺和低效运作。价值规律在这里表现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迫使各个资本集团在国家统制的框架下依然相互竞争，从而削弱了整体的经济潜力。

因此，法西斯主义的经济体制注定是昙花一现的。它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国家干预和军事扩张来缓解危机，但从长期来看，它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它不仅加剧了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还破坏了经济的正常发展。最终，法西斯主义必然在战争和危机中走向失败。意大利在1943年被盟军击败，墨索里尼被推翻；德国在1945年战败，纳粹政权覆灭；日本在1945年投降，军国主义崩溃。这些历史事实表明，法西斯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出路，而是资本主义在危机中走向极端的表现。它的失败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经济和社会制度上的必然崩溃。

如何判断一个在野组织是不是“法西斯”

要判断一个在野组织是不是法西斯，不能机械地套用二十世纪意大利黑衫军或德国冲锋队的模式。准军事化的暴力组织确实是法西斯主义的典型特征，但并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在现代条件下，尤其是在一些已经高度集权、依靠国家机器维持统治的社会里，可能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街头暴力集团，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类似的功能。因此，如果我们假定存在一个没有实现准军事化的情况下，那么判断一个在野组织是否具有法西斯性质，就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从阶级基础、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来考察。我们要避免把“法西斯”当成随手可用

的骂人标签，用结构性与功能性指标来识别，而不是靠情绪或表象去下结论。网络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言论、情绪化的“出征”，在气质上可能与历史上的法西斯动员有相似之处，但这类“相似性”远不足以构成法西斯的实质。**真正的法西斯，是一种能够在资本主义危机中承担特定历史任务的政治组织形态：它必须被资本扶植或默许，必须拥有可复制的暴力与组织技术，必须以摧毁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为核心目标，并且拥有将这种暴力常态化、制度化的路径。没有这些核心条件，再响亮的口号、再激烈的民族主义表演，都与法西斯相去甚远。**

第一条必须把握的，是组织形态与强制能力的门槛。法西斯不是松散的舆论群体，而是可动员、可指挥、可复制的组织技术。它需要纪律化的层级结构、稳定的领导核心、明确的战术和后勤体系，能够在冲突中保持行动一致、执行力强，并形成对敌对组织的持续压制。**这种压制不只是网络骂战或声誉打击，而要能在现实空间内形成威慑，迫使工会、左翼组织、独立社团失去安全运作的条件。没有这类可复制的强制能力，最多是情绪化的群众动员或“舆论暴力”，远未达到法西斯的门槛。**正因如此，去观察一个在野组织时，不是看它喊了什么口号，而是看它是否具备持续的线下组织能力、后勤供给、行动纪律、对敌组织的压制效果，以及在失败后的恢复和再动员能力。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群体之所以与法西斯有距离，恰恰是因为它们高度去中心化、短时性强、缺乏线下组织纪律与后勤保障，不具备把舆论动员转化为现实暴力压制的技术与基础。

第二条是阶级联盟与资金来源的门槛。历史上法西斯的上台，取决于其与垄断资本的联盟：资产阶级在危机中需要一个能够摧毁工人独立力量、保证利润与秩序的工具，法西斯则提供这种暴力服务。因此，观察一个在野组织是否法西斯，要看它是否获得来自大资本、行业协会、地产金融等强势资本集团的稳定资金与保护；是否在政策诉求上明显与垄断资本利益一致；是否通过商业合同、基金会、广告与平台分发等渠道形成制度化的资源供给；是否在面对国家惩戒或社会抵制时，能够得到资本与权势网络的护航。没有这种稳定的联盟，一个组织再激进也很难完成从街头到国家的“跃迁”。**网络民粹主义大多停留在“平台流量 - 短期情绪 - 去中心扩散”的循环，并不具备资本联盟与制度化资源供给的结构，这也是它为什么是碎片化的民粹主义，而不是法西斯的核心原因。**

第三条是政治功能的门槛。法西斯的独特性不在于“极端”，而在于它承担了明确的历史任务：在革命危机中，以群众暴力配合国家机器，摧毁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把劳资冲突转化为民族冲突，进而为垄断资本重组秩序。在野组织若要被判断为法西斯，必须在实践中以系统的反工人策略为中心，例如围绕破坏工会、渗透并收编基层组织、鼓励或实施对工运和左翼的暴力与法律打击、推动立法取消集体行动权与组织权，并且将其作为长期目标去推进。**仅仅“反对左翼”“反感工会”“指责某些特殊群体”，并不构成法西斯。**把矛头稳定、持续地对准工人独立组织，把“阶级斗争”系统性地转换成“民族动员”，才是法西斯的功能性标志。网络民粹主义更多是以身份政治与情绪发泄为主，其攻击对象与议题变化频繁、不可持续，并不具备这种稳定的功能指向。

第四条是意识形态与组织路线的门槛。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极端民族主义与反共主义，但这不是靠话语上的“极端表达”来判断，而是看其**是否在组织路线中，**

把“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秩序恢复”等口号与对工人独立性的系统打击结合起来；是否形成“群众反对群众”的结构，即动员小资产阶级、失业者与流氓无产阶级去压迫工人阶级，并建立可复制的行动框架；是否在宣传中持续把社会矛盾转移到少数群体上，并提供组织化的“解决方案”（如清除、驱逐、强制改造等）。如果只是“讲得很激烈”“骂得很难听”，但没有把意识形态转化为组织路线与持续行动机制，就不能以法西斯论之。现实中，很多网络民族主义并不具备从口号到组织到行动的闭环，更多是短期的、平台算法驱动的意见潮汐，这与法西斯的组织性和目的性截然不同。

第五条是制度化路径的门槛。真正的法西斯必须有明确的“从运动到政权”的通道设计，能够把非常态暴力常态化、把组织化压制制度化。例如，争取对警权的渗透或联动、推动准军事组织的合法化或“志愿民兵化”、通过立法与行政手段取消罢工权与结社权、在教育与媒体中建立稳定的灌输体系。这类“常态化路径”是区分法西斯与普通极端组织的关键。没有制度化与常态化的设计与推进，一个在野组织即便短期内能制造舆论声势，也难以成为法西斯。观察现实中的网络民粹主义，它们高度依赖平台机制、缺乏对制度的稳定渗透能力，也没有把暴力或压制转为法定常态的能力，这使它们与法西斯保持了本质距离。

第六条是经济纲领的门槛。法西斯的经济主张表面强调国家干预，实质是用“统制”来保证垄断资本利润与战争动员，把国家当作卡特尔化协调者，而不是去实现社会化生产的合理计划。一个在野组织若以此为纲，通常会主张取消工人谈判权、把工会纳入“统一组织”、以“国家利益”为名压低劳动成本，并提出对关键行业的行政统筹与战时动员机制。这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完全不同，它不是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标，而是服务资本利润与军事目标。如果一个组织的经济主张只是一般性的产业政策、反腐口号或福利诉求，缺乏对劳资关系的反工人重构与战争式动员，那就不能用法西斯来判断。

在这些门槛之外，还要警惕“相似性导致误判”的几个常见陷阱。第一，网络民族主义与“出征”行动往往呈现强烈的敌我划分与情绪化攻击，但它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后勤、暴力常态化路径都很弱，更多是算法驱动的“流量洪水”，不是阶级联盟驱动的暴力机器。第二，保守主义与威权主义可能在政策偏好上对民权不友好，但只要它们不以摧毁工人独立组织为明确目标、不系统性地组织群众暴力，就不能被称为法西斯。第三，波拿巴主义依靠的是国家机器的“上层统合”，它在阶级僵持时以调和者姿态维持秩序，不需要群众性暴力来摧毁工人阶级。只要一个组织的政治路线是服务于上层机器的调和与稳定，而不是以群众暴力为核心摧毁工人独立性，它更可能是波拿巴主义的附庸或工具，而非法西斯。中国语境下的许多网络“粉红”民族主义与平台动员，恰恰是去中心化与短时性的，它们在结构上缺乏法西斯的阶级联盟、组织技术与制度化路径，因而在性质上离法西斯很远。

因此，一个在野组织是否可以被认定为法西斯，必须同时满足若干核心条件：具备稳定的组织技术与可复制的现实强制能力；与垄断资本形成资金与保护联盟；以摧毁工人独立组织为中心的长期政治功能；把极端民族主义与反共主义转化为组织路线与持续行动；拥有把非常态暴力常态化、法定化的制度路径；提出以国家统制保障垄断利润并压低劳动权利的经济纲领。只满足其中少数、且缺乏结构与功能的闭

环，不足以构成法西斯。把门槛设在结构与功能层面，而不是话语与情绪层面，既可以避免把普通的网络民粹误判为法西斯，也能让我们在真正的危险出现时，迅速而准确地识别它的核心特征，确保我们的分析严肃、准确、可操作。

捍卫和坚持民主集中制

为什么需要民主集中制？

贯穿整个工人阶级斗争历史的一个事实就是，工人阶级的敌人——骑劫在工人头上的，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一个高度集中、组织严密、行动迅速的暴力工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每一位共产主义革命者都必须深刻意识到的一点，幻想资产阶级政权在面对工人阶级的反抗时将政权拱手相让是不现实的，它必定会以一切包括暴力的手段对工人阶级革命进行血腥镇压。因此，一个组织工人阶级革命的先锋政党，无论它是冠以什么样的名号，都必须要在组织行动的严谨程度、迅速程度、集中程度上也达到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相当的水平，甚至是要做得比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更为出色，方有一战之力。

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历史恰恰提供了一个与上述论断相反的例证。作为欧洲最早的工人阶级政党之一，它在19世纪末便已成长为普鲁士帝国的帝国议会中的最大反对党，拥有广泛的工人群众基础。然而，当历史真正进入到决定性的关头时，这个政党却没有表现出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相抗衡的集中性与战斗力。SPD之所以会沦落至此，并不是单纯的“背叛”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力量格局发生变化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工人阶级虽然在数量和组织上都空前壮大，但他们的政治代表，即SPD却逐渐失去了作为阶级先锋的角色。原因在于：一方面，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战争和战后危机中依然保持了核心的军队、官僚和资本控制力；另一方面，工人阶级虽然有罢工和委员会运动的爆发，但**缺乏一个能够集中力量、迅速决策的组织制度**。SPD没有培养出一支能够在地下斗争、武装起义和群众运动中迅速行动的干部队伍。它的干部多是议员、工会官员和地方组织者，擅长谈判和管理，却不具备在革命危机中统一调度的能力。党内也缺乏一个能够在危机时刻统一意志的集中领导机构，导致在关键时刻不必要的党内争论的不断拖延了决策，使得行动迟缓，最终只能依赖资产阶级议会的程序和其他妥协手段，而无法形成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相抗衡的革命力量。这种劣势在1918年革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工人和士兵苏维埃本来是一个能够挑战资本主义的新国家机器的雏形，但SPD领导层却把它们当作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渡工具”，因而迅速把权力交还给传统的军官团和资产阶级议会。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把群众的自发力量转化为新的国家形式，而是依赖旧的统治结构来维持秩序。这种做法使得工人阶级的主动性被削弱，胜利的天平也因此重新向资产阶级倾斜。

为了建立起一个真正严密而有战斗力的革命组织，共产主义者必须依靠党内民主的方式来实现。任何人都不能幻想某个人或小团体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永远做

出正确的决策。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只有把全党集体的经验、智慧和实践总结起来，才能形成科学的路线和方针。党内的民主环节——**自由的讨论、公开的辩论、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人的选举与监督**——不能是装饰品，而是保证决策正确性的唯一途径。如果缺乏这样的民主，所谓的“集中”就会蜕变为少数人拍脑袋的独断，最终导致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

但是，民主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地分裂成派系。革命党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党派，它不能容忍那种以小集团利益为核心的派系存在。党内的分歧必须通过公开的、受保障的民主讨论来解决，而不是暗箱操作或小圈子争斗。一旦经过充分讨论形成统一意见，全党就必须像一台机器一样，毫不迟疑地贯彻执行。这种高度统一的行动纪律，正是革命党区别于松散组织的根本所在。

为什么我们需要民主集中制？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本身就是高度集中、组织严密、行动迅速的工具。如果工人阶级的政党只是一个松散的辩论俱乐部，只会陷在无休止的理论争吵里，那么它在现实斗争中必然一击即溃。面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这样的组织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只能被历史淘汰。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和“集中”就像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集中；没有集中，民主也无法转化为实际的力量。

一些庸俗的左派和宗派主义者总是把“集中”曲解为独裁，认为这是压制个体的表现。但事实恰恰相反。只有通过党内民主，才能真正把全党的智慧凝聚起来，形成科学的决策。集中并不是少数人意志的强加，而是全党集体经验的结晶。正因为如此，集中才有力量，才有方向。否则，一个没有民主的集中，只会变成官僚的独裁工具，最终导致党的僵化和分裂。

这里必须强调，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一种抽象原则，它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组织架构中。革命党必须有明确的领导层级。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它由全党选举产生，代表全党的意志。中央委员会再从自身成员中选举产生政治局，负责处理重大决策。政治局之下设有书记处，书记处的任务是处理日常的组织事务，而不是代替政治局做出战略决策。换句话说，**政治局必须主导决策，因为它代表的是全党的集体意志，能够高效而统一地制定政策**。如果让书记处主导决策，权力就会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削弱党内的民主讨论和集体智慧，导致决策偏离全党利益，破坏党的团结和效能。

同时，革命党必须建立起防止官僚化的制度。基层党员必须有权随时罢免任何一位中央委员会成员。这不仅是对领导层的监督，更是保证党始终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领导层脱离群众、滋生腐败或独断专行。革命党的活力和责任感，正是来自于这种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

民主集中制的真正力量，不仅体现在它能够把基层的活力和中央的集中结合起来，更在于它要求每一名党员都必须通过实际工作来体现自己的责任。一个革命党如果只是依靠少数知识分子或干部的个人能力，而没有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建立起坚实的基层组织，那它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群众党。群众党意味着党必须在工厂、学校、社区等各个基层场所建立起支部，把党的路线和政策落实到每一个角落。但这些支

部并不是空壳，它们必须由真正履行义务、积极参与组织事务的党员来支撑。只有那些在日常工作中承担责任、贡献劳动的成员，才配得上享有党内的权利。相反，那些只挂名、不参与、不履行义务的人，就不能成为党的成员。

这样的要求，使党不至于沦为一个松散的联盟或单纯的学习团体，而是一个以实践为基础、以行动为核心的整体。基层党员不仅是执行者，更是信息的提供者和监督者，他们把群众的意见和斗争经验带到党内讨论中，使党的决策始终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与此同时，中央机关则要为基层提供战略视野和组织后援，把分散的力量统一起来，形成纪律性和凝聚力。只有当个人的意志和力量真正融入到集体的组织之中，党才能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实现高度统一的行动。这样，民主集中制既保证了党内的广泛参与，又锤炼出强大的执行力，使党能够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保持活力和战斗力，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我们如何捍卫民主集中制？

共产主义者们领导的革命组织，要捍卫民主集中制，就必须要和其两个要素的反面倾向做针锋相对的斗争：基于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和基于无政府主义的“纯粹民主”。

要避免组织僵化，以及组织内部形成的独断官僚，就必须时刻保持组织的有机运作，这就是组织内的民主。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组织内一切基于团结而不是基于分裂的争论，必须得到充分的包容和保障，围绕对组织的工作路线、理论指导、斗争方针等一切大小问题上的讨论都应该公开进行，并容许充分辩论。如前文所述，组织的科学决策是来自组织整体的实践总结，故无论是少数派还是多数派，表达意见的权利都必须得到保障。历史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少数派的意见往往在一开始不被采纳，但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却可能迅速转化为多数派意见。这并非偶然，而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体现。社会意识往往滞后于现实，当矛盾激化、局势突变时，原本被视为“过激”的少数派主张，反而最能切中要害，从而赢得群众的广泛认同。它们最初都处于少数，但最终证明了自身的正确性，并成为全党全体的共识。这种转化在组织生活中常常表现为“全票通过”。然而我们必须明白，这种“全票”并不是形式上的压制，而是党内民主充分展开、经过激烈争论后形成的高度统一。它恰恰说明了列宁式政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相反，如果把民主理解为机械的“百分之51对百分之49”，就会把分裂当作民主，把对立当作活力，这不仅削弱了党的统一意志，也违背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根本原则。真正的党内民主，是在充分讨论、允许少数派坚持意见的前提下，最终形成全体一致的行动。这样的统一不是表面的，而是建立在对现实矛盾的深刻把握和对历史方向共同认同之上。正因为如此，少数派的正确意见一旦被历史证明，就能迅速凝聚为全党的意志，推动斗争走向胜利。

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组织内部需要进行不同工作部门的划分，这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带来的每个工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干部和领导，也是不可避免地需要迫切选举出来，以确保在民主的进程顺利完成后，干部作为一个组织“高度集中”的监督者来推进组织工作。任何的干部、领导都必须通过组织内投票、决议、选举产生，且必须对选举他们的部门高度负责，最重要的一点——全体组织成员必须完全保留对所有干部、领导的罢免权力，以防止干部的不称职、腐化甚至是背叛，

这也是布朗基主义式的政党所不能做到的，它们往往会随着时间在组织内形成一个僵化的官僚领导组织，甚至会发展出自身的特殊利益，反过来要求革命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他们为革命的利益服务，在组织内打压一切异见，垄断决策权力，这种失去了组织有机性的政党在历史上已经向我们证明了其不具备领导工人阶级的能力，最后甚至会反过来要求工人阶级为其统治服务，甚至是背叛工人阶级。因此，要保留这种权力，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干部领导层有责任定期召开代表大会，向全体成员报告工作，接受成员的批评和监督，解释一切工作、决策背后指导理论的来龙去脉，以防止领导和干部逐渐脱离基层。

而要保持组织的“高度集中”的行动力，就必须要求组织成员具备“党性”，自觉地服从组织的工作安排，参与组织的民主议程，尊重组织的民主决策，不论该成员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有义务在行动上彻底地、积极地贯彻组织的决定。历史上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岌岌可危，旧俄国军队已经瓦解，但是德帝国主义的军队正在长驱直入，威胁新生的工人国家——立即退出世界大战是迫切的。然而，围绕如何应对德国的苛刻条约，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展开了尖锐的争辩：列宁主张“以空间换时间”，保住苏维埃政权火种，等待欧洲革命爆发；布哈林则认为屈辱求和是向帝国主义投降，主张发动革命战争，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参与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经历了数周的公开的、激烈的辩论，经历了托洛茨基“不战不和”的策略的破产，最终列宁的主张以微弱优势胜出一——但是，尽管布哈林等人认为这是“屈辱的”、“毁灭”的决策，但是他们并没有分裂，而是留在了党内执行了他们一贯反对的政策。这就是革命组织“集中”的体现，即使是革命生死攸关的关头，一旦民主进程通过了决定，无论是少数派还是多数派，都必须服从组织意志，保证全党统一行动。其次，组织内允许观点的自由交锋，但是决不允许有派系斗争，即组织内形成独立的小帮派组织，形成了独立于组织的派系纪律，所有的争论的前提必须是维护组织的统一和团结（前提是组织依然是有机的革命党，是代表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而不是服务于其领导官僚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促进了组织的派系斗争。“工人反对派”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党中之党”，它们诞生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拥有自己的工作手册和工作纪律，这种党的出现会破坏革命组织的团结和统一，最终也会被阶级敌人所利用；不过，这种原则在也被后来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者滥用，它们将一切反对意见都污蔑成“党中之党”，这是对民主集中制的歪曲和破坏。最后，组织纵然内部存在意见分歧，但是对外口径必须统一，不能将组织内矛盾示予阶级敌人，这也是“高度集中”的行动体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反面教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反对起义”的意见在党内的民主表决中被否决后，气急败坏地在非党内的公开报纸中泄露党内准备武装暴动的最高机密，这使得革命党瞬间处于极为不利的局势当中，这就说明了革命组织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统一对外口径”，分歧和争论，必须严格限制在组织内部当中。

无产阶级和左派的彷徨

比起僵化的组织结构，现代左翼组织所要迫切解决的反而是小资产阶级式的松散、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以及宗派主义式的阵营划分。这种倾向甚至不能让左派形成一个初步的有生力量的组织，自然的，避免组织僵化也无从谈起。

小资产阶级式的松散以及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大致上可以归为一类，细节的差别不能

阻碍到这两者最终产生了一样的共鸣：排斥“集中”，追求无限制的“民主”，任何这样类型的“革命党”（往往是自我宣称的）都不可避免的将组织的所有工作都局限在辩经，久久无法统一组织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自然的，所谓的“革命党”的工作就是纯粹的清谈，难以形成统一的决议和行动，这种模式在资产阶级暴力机器的打击下往往不堪一击，最终总是陷入瘫痪和分裂。近代历史中，1936年到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就是一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弊病历史。在内战中，武装工人击败了法西斯叛军，但是其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它在面对实际权力的时刻突然陷入彷徨：究竟是掌握胜利果实建立工人政权，还是忠于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信仰”？结果就是领导武装工人的“全国劳工联盟”进行了无休止的辩论，最终选择放弃夺权，与资产阶级政府“合作”；另一边，这支军队实际上也是涣散的组织，不是强调统一的纪律，而是强调“自愿纪律”，反对统一集中的军事指挥，尽管在巷战中非常英勇，但是一旦和高度集中的、由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武装的职业军队进行正规战时，则显得纪律涣散，不堪一击，并最终在国家内部被斯大林主义控制的西班牙共产党清洗。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则可以直接数到1989年的中国六四学运，中共在纳入市场化以来导致的贪污和腐败最终催生了反对它的知识分子集会，不过，尽管在核心诉求上尖锐正确地指出了中共的弊病，但是其本身的“小资产阶级式”的松散，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首先是没有意义、无限制的民主：青年只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组织“清谈馆”，运动从头到尾没有形成统一决议，学生领袖之间派系林立（“高自联”、“绝食指挥部”），互相争斗，谁也无法统一指挥，上一个决定刚作出，很快就被另一群人的热情推翻（例如是否撤出广场）；其次，学运没有形成统一的行动纲领，初始诉求随着运动的发酵越来越模糊抽象，甚至在与政府对话时，连派出哪个代表去都无法达成一致；行动上也是瘫痪的表现，无论是绝食还是请愿，都是被动的、防守的姿态，表面上声势浩荡，但其实外强中干，内容上根本就不具备主动权，运动始终停留在消极的被动抗议，而不是主动组织工人罢工（甚至是在有工人自发组织支持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习气促使他们不会这样做，这一点和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运动异曲同工），更没有制定任何面对局势恶化的应对策略。综上，这样一个涣散的运动组织，纵使它提出的意见多么进步，但一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下定决心使用武力，前者在面对高度集中、纪律严明、指挥统一的暴力机器镇压下，几乎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而另外一种宗派主义式的阵营划分，更是阻碍了有机革命党形成的最大毒瘤。这类组织通常进行自我神化，宣称自己组织是唯一的“革命先锋队”，其他所有左翼都是“叛徒”，“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并且通常站在工人阶级实际斗争之外，从旁批判、嘲讽，而不是投身其中去赢得领导权，最常见的大部分宗派主义组织，往往立足的根本是通过“攻击其他左派组织”而获取的；他们甚至还“攻击群众”，向群众提出“要么接受我们的完美纲领，要么就滚蛋”的最后通牒，而不是根据群众当下的意识水平，提出过渡性的要求；最后，就是拥有强烈的组织拜物教的思想色彩，组织的目标从推进斗争变成了纯粹的“建设党”，深陷于互相攻讦和互相抢人的无聊游戏，以壮大自己的“小团体”。这种意识形态毒瘤使现代左派组织和无产阶级画地为牢，利用那些在无产阶级中享负盛名的领袖作为自己的招牌，无法接受任何质疑，互相指责对方不是“正统”，因此数十年来的左派组织，无论规模大小，都长时间地把有限的精力耗费在这种破坏团结的攻讦上，无法形成

统一力量。历史上这种现象就引起了列宁对于“左派幼稚病”的思考：20世纪初的改良主义英国工党充满了混乱，而当时英国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是社会民主联盟，他们宣称自己有“纯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不起工会领袖的改良主义，拒绝和工人领袖合作，并对工党的每一个错误都大加批判。但是结局却是：工党在长时间的实践中吸引了数百万英国工人的支持，成为了代表英国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而社会民主联盟虽然自称拥有最“正确”的理论，却因为自我孤立而完全被工人运动的洪流边缘化了，自始至终都是无关紧要的边缘小派别。现代的左派组织也不乏这种群体，抱着某个理论家和领袖的招牌当作做永远正统，只要有一点反对意见都无法接受，拒绝与任何其他意见有差异的左派组织合作，并进行自我的孤立。

现代左派中的一个最好例子就是自称“马列毛”的左派组织，这一派别将特定历史的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僵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的“革命真理”的倾向。他们的核心叙事是：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已经复辟，因此毛泽东的思想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延续，更是最高阶段，这种意识形态，天然地带有一种优越感和排他性，意味着所有不接受这一想法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传统亲苏派、托洛茨基主义者，还是别的什么独立共产主义者，都被视为停留在历史旧阶段的、过时的、甚至是反动的“修正主义者”，革命的火炬只掌握在他们手中；毛泽东的“农村”战略无疑是当时旧中国的最好良药，这也是为什么所有共产主义者都不能否认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作出的贡献，但是宗派主义的毛组织将这种特定历史的策略提升到了一个普世的革命教条，并甚至以此为标准去衡量一切斗争；在发达国家，宗派主义毛组织因为无法将“人民战争”套用在现实中，因此他们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认为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被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所购买，变成了“工人贵族”，已经丧失革命性，最后竟然脱离自己所在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只把希望投寄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受压迫人民中，变成了支持远方“人民战争”的拉拉队；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于毛泽东革命理论的盲目崇拜和无条件接受，使得他们对任何其他共产主义左派组织大为忌憚，认为一切其他左派组织都是在尝试争夺革命领导权，因此他们参加群众运动或者是左派集会的目的，往往是寻找和攻击其他左派，而资产阶级这个真正的阶级敌人，却暂时地被他们降低了斗争优先度。讽刺的是，毛泽东的哲学理论事实上是非常出色的，其本身包含了丰富的非宗派元素（群众路线），本应是克服宗派主义的最有力武器，但是却被其追随者，尤其是那些脱离了本国群众斗争的实际团体，偶像化、教条化、并成为一种用以区分敌我的僵化意识形态时，它就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强烈的宗派主义色彩，但这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必然结果，而是将其理论僵化和绝对化的结果。综上，数十年来无数左派组织就是在这样的无止境的内耗当中，迟迟无法建立起有力的革命团体，而悲剧在于，这种孤立的结果却往往始于对革命原则的真诚坚守，但却因为教条主义和脱离群众，走向了革命的反面。真正的列宁主义组织模式与其恰恰相反：它要求革命者必须深入到群众所在的每一个地方——无论那是一个多么“不纯洁”的工会，还是一个改良主义的政党——用群众能理解的语言，通过共同斗争的经验，去耐心地赢得信任，并领导他们走向革命，从外面喊话的先知，永远成不了领导群众的先锋。

当然，这是否表明我们无需对僵化的组织——即斯大林主义作进一步阐述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只有严肃地同斯大林主义倾向作斗争，革命组织才能保持真正的活力和有机性。我们熟悉的苏联式斯大林主义，是一种盘踞在党和国家机器之上的官僚统治，它依靠任命、清洗和高压手段来维持权力。而更“纯粹”的斯大林主义原型，则表现为一种彻底的密谋集中制：由少数自我任命的领导集团掌控一切，不对群众负责，只对他们自定的“革命计划”负责。这样的组织逻辑，天然地排斥群众的主动性，把党变成了凌驾于阶级之上的权力机器。

因此，共产主义左派在建设革命党时必须时刻警惕。党与群众的关系，既不能是斯大林主义式的“精英代办”，由少数人替代群众去行动；也不能是斯大林主义式的“主仆关系”，由官僚集团操纵被动的群众。真正的关系应当是“鱼水关系”：党是阶级的先锋，但先锋必须深深扎根于工人运动之中，在领导的同时不断学习和接受群众的监督。

在组织内部的民主问题上，斯大林主义的危害更加明显。它要么是彻底的“绝无民主”，只有自上而下的命令和绝对服从；要么是假民主，表面上“全票通过”，实际上任何不同意见都会被打成“反党”。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应当是“讨论时自由，行动时统一”：允许充分的、甚至激烈的内部辩论，以便形成最正确的决议；一旦决议形成，全党统一行动。

在革命和党建的目标上，斯大林主义同样走向了歧路。它不是为了建立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而是把组织变成维护官僚集团特权的工具，并且常常打着“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旗号来掩盖这种现实。结果是，党和国家机器不再服务于工人阶级，而是反过来压制工人阶级。

两种错误的组织模式，都是造成了数十年无产阶级和中国左翼的悲剧和彷徨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健康的民主集中制，正是建立在对上述两种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之上的一一它既非官僚专断，也非一盘散沙，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保持其革命生命线的一剂良药。

扩大的组织规模

组织建设中的一个永恒挑战，就是随着组织从几十人发展到成百上千甚至数万人，民主集中制的维护和践行的解决方法也必须得到相应的发展。

首先，成文的章程和明确的纪律是重中之重，党员的权利和义务、组织的结构和议事规则，不仅要明确地成为所有为所有党员所知，且准则对所有党员平等，领导干部不允许有超越组织准则的特权；其次，随着人数的增加，入党的标准和程序必须适当地抬高，革命组织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俱乐部，革命组织是进行着现实的阶级斗争，不是随随便便的过家家游戏，人数的增加意味着组织的统一协调的难度也随之上升，因此对于党员个人素质的要求必须要提高，申请人不仅需要经过考察，认同党的纲领，并且必须要具有“党性”，自觉地服从党的纪律和安排；基层的支部生活同时也应该得到建立，党支部是党的基础，支部的会议、政治学习、任务分配和工作汇报，是防止党员变得懈怠、锻炼党员、执行决议的基本保障，健康的支部工作确保每一位党员都能对整体的组织工作作出有效贡献，反之，一个没有

健康的支部生活的党员，对组织工作敷衍了事，工作汇报和支部会议也是得过且过的，在内容上已经脱离了组织，也不具备事实上的“党性”，此类现象必须严加审视，并以民主议程推进自我的和互相的批评指正，从而防微杜渐，防止“懈怠”的歪风在组织内部扩散，并影响整体组织工作。

组织规模扩大后，如何进一步维持民主集中制和效率呢？首先，**一个稳固的干部队伍是需要的，也就是中层的骨干，当核心领导层依照其现实条件难以时刻接触到每个成员时，一支由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经过考验的、得到基层信任的中层干部队伍就变得至关重要。**他们是连接中央和基层的“神经系统”，负责上传下达，既能将党的统一决议具体化，也能将基层的声音和情况进行反馈，同样，如上文所述，这群骨干必须通过组织内民主选举产生，并且骨干要对其选举部门负责，另一边，全体党员必须完全保留时刻对干部进行监督和罢免的权利，从而避免干部领导脱离基层，甚至滥用职权；其次，代表大会制度需要进行完善，通过层层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是实现大规模组织民主的核心机制。基层支部选出地区代表，地区代表选出全国代表，确保最高决策能代表全体党员的意志；随着人数的增加，内部的思想教育也应当不断加强，成员背景愈加复杂之际，必须通过党校、内部党刊、学习会等方式，进行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组织原则教育，以及对平日工作和斗争行动的汇报总结，确保全党由统一的政治语言和分析方法，思想上的统一永远是行动上统一之根本。

民主集中制是一个活的、充满内在矛盾的有机体，而不是一个僵死的公式。维持他的健康运作，需要全体党员，尤其领导干部，时刻保持警惕，持续不断地同官僚主义和自由散漫这两种倾向作斗争。它是一条线菌的道路，确是通往胜利的唯一道路，只有掌握了这个武器，无产阶级才能将自身锻造成一支有能力埋葬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纪律严明的军队，从而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当代政治报的危机与路线

当今中国大多左派组织的政治报，无论篇幅长短、无论更新频次都落入了一种机械的、复制主义的危机。此种复制主义并非对过去革命出版物如《火星报》和《真理报》在经验、运作模式和办报方针上的研究和在当下社会环境与物质条件内的落实。该危机将一切本应该花费在完善理论体系和办报逻辑上的时间与精力全部投入在如何让自己的政治报看上去像是《火星报》、《真理报》、《红旗》又或者是《人民日报》。为了这一目的，这些报纸的撰稿人详细地模仿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革命者如何使用“呵”、“嚯”等拟声词来丰满自己的表面工作，却忽略了对政治报具体路线和理论的学习。就像马克思这位“被复制者”曾经叙述的那样：“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必须点出的是，当今革命组织的政治报应当罢黜这类机械的复制路线，只因其天真地寄希望通过扒下几十年前刊物的名号来塑造出一种理论上的权威与厚度，好像如何产出文章、如何制成报刊、如何将政治报作为全国革命组织建设的矛头等问题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在革命的各个阶段中，报刊等出版物应当在担负着“推进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总的历史使命时承担起不同的任务。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9月写道：“现在，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即政治空谈，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的建设，建设中的种种事实，占的篇幅太少了”，可见当时紧迫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具体的建设方针（弗·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而将这一论述替换到如今政治报之任务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在各类臆造政治概念和虚假指控横飞的时代完善共产主义者的理论体系，并在中共政权的监察体系下呼吁且建设起一个有群众性质的共产主义革命党和地下联络网。

共产党人是务实的革命者，不是带着面具、穿着古板制服的红色样板戏演员，这一点在文字与笔尖的斗争中同样适用。这是所有革命的共产党人都应当认识到且贯彻到的：“假使判断人们的时候，不是看他们给自己穿上的漂亮礼服，不是看他们给自己取的动听的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弗·列宁《怎么办？》）。而后续本文将涉及到的问题与危机，也大多源自于机械复制者们对老台本的再演绎。

恪守“批倒批臭”和48小时的胜利

毛泽东在1967年8月做出指示，说要在批判运动中“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倒批臭，

这是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前途和世界命运的前途的大事”（毛泽东《关于大联合的指示》）。如今，批倒批臭这一写作模式还影响着许多中国的左派政治刊物，刊物的发行者将报纸当成了一种执行“批倒批臭”口号的武器，甚至都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置之脑后了。需要强调的是，所谓恪守口号的问题本质上是思维固化的问题而非“批倒批臭”这四个字。这一问题已经逐渐演化成了一股新的危机，异化着左派组织的出版物。这一思维要求政治批判这一行为并非源于共产主义的理论，而是让共产主义理论服务于批判这一直接目的，选择性地、公式化地摘录并脱离现实地拼凑出能够执行“批倒批臭”的辞藻。在“批倒批臭”的话语体系下，被批判的对象将成为数种丑恶的叠加态，这一举措能让政治刊物获得大概48小时左右的胜利，毕竟无人能在2天内摘下报刊罗织的数项“罪名”。至于为何要恪守这一口号，又出于什么目的地投身于各类批判词汇的臆造上，我们只能猜测这48小时内的胜利对撰稿者或其所属组织来讲是相当珍贵的。

这一误区并非仅限于信息传播飞速的互联网时代，其伴随着现代各组织的政治出版物而生。俄国革命早期，《火星报》就被打上了“学理主义”、“教条主义”、致使“党的僵化”等标签（《工人事业》第10期）。一条一成不变的规则就是：左派组织的出版物习惯将其他路线不同的左派打成右派或者某类反革命，这在信息流通不畅的环境下以牺牲理论上的正确性为代价换得了宣传上的杀伤性。例如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各左派组织就展现出了这饱含问题的政治报生态，无论是工人社会党的《光明报》、西班牙共产党的《工人世界报》还是各类无政府主义工团派的报纸，如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土地与自由》。1933年11月10日发行的《土地与自由》就曾批判的左派组织都是“顽固的右派”且全国“唯一的左派组织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它是真正的革命组织”。

我们不妨看看若是继续恪守这一写作逻辑，当代中国左派组织的政治刊物会如何腐烂下去、僵化下去。本文以《工人革命报》2025年8月11日发布的特捌期为例，看看这份报刊是如何把我们组织“批倒批臭”的。在《工人革命报》特捌期中，我们是坚定不移的“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者小资产阶级”、“叛徒”、“卖国贼”、“金日成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修正主义的大杂烩”。同时，我们组织的理论都是在“翼赞叛徒邓小平、习近平的法西斯主义”、“鼓吹南斯拉夫法西斯主义集团”、“对马斯克的尾巴主义”、“帮助资产阶级女性打拳”、“对秦朝法家封建主义的落后部分的谄媚”、“吃起林肯的人血馒头”、“极端仇视以秦始皇为首的封建主义法家的进步势力”、“妄图充当21世纪的奴隶主阶级”、更是主张所谓“刘少奇主义的‘唯生产力论’与‘阶级斗争熄灭论’、‘群众落后论’”（《工人革命报》特捌期 第二版 - 第二十二版）。这一份着迷于公式化用词和论战的政治出版物不具备任何对革命运动的推进作用，这类政治性刊物在左派运动中屡见不鲜。甚至由于其本身与马克思主义的脱钩和大量纯粹凭空捏造的罪名，连辩驳意义都不具备。我们不妨用实例看看这类政治报写作者仅限文章标题与封面的“惊人”阅读量：其指控我们的《资本和权力，哪个剥削人》一文是“对马斯克的尾巴主义”，但是除了封面上有马斯克的照片外全文未提及该人；对《如何实现女性解放？》一文的批判则更加地虚无缥缈，在我们反复强调了“小资产阶级女性”落入的“身份政治”陷阱、资本主义“强大的阶级分化与强化机器”和唯有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上“真正的性解放和性自由才得以实现”之后，《工人革命报》的写作者们仍是在扫视了一眼标题后就扣下了我们“主张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

帽子。我们必须承认，《工人革命报》还是展示了时代的进步，相比于撰写《土地与自由》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写出我们组织谄媚 2232 年前灭亡的政权等一系列指控后，这份当代的政治报在各类词汇的排列组合上展现了新的突破与唯心思想的新下限。如今，全中国左派组织的几十份、几百份政治报所在的就是一个如此动荡且充斥着危机的十字路口，要么迈向一个全国革命党的机关报，要么成为披着政治刊物之皮的低俗小说。

也许一些人会质疑说：难道在这个危机的十字路口我们要放弃政治批判吗？这也是一大误区。就如同先前停止机械复制的呼吁不是让当今的组织停止办报，强调放弃臆造词汇与罗织罪名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政治批判的武器融毁。甚至可以说，先前以《工人革命报》为例的政治内容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判，而是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相像的语言表述来包装其辱骂与歇斯底里的本质。从我们如今还在阅读百年前由列宁等革命者写就的政治批判可见，若是政治报的写手们、编辑们都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政治批判的威力与胜利会持续的比 48 小时更加久远。所有的政治出版物都应当明白政治批判的意义，其效益不在于直接驳倒来自各方的反动声音，而是在跳脱出两方之争辩的更大范围内消灭反动声音的可信度。简要举例，若要对某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言论做政治批判，《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的不该是将这位经济学家以某种奇迹般的手段感化，而是在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战线上争取更多的观众与摇摆者。就像俄国革命早期的《火星报》不是为了消灭《工人事业》报，中国革命中的《人民日报》不是为了击垮《中央日报》，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报刊应当将建设革命组织与完善革命理论体系作为首要目标，至于论战中的对手的投降只是这一过程中附加的胜利。

中央机关报：党的笔锋

在上述的两类危机下，政治报不该再纵容仅靠机械复制的“政治空谈”，也不该在政治骂战中固执地消磨时间，更不该存在离散的、游离于组织框架之外的撰稿人，甚至可以说各类危机的涌现与自由撰稿人的存在离不开关系。在大部分政治报都在互联网进行组织的情况下，独立撰稿人们、投稿者们变得更加泛滥：通过今天发一封邮件、明天发一封稿子、本周其余时间休息的模式“干革命”。这样的供稿和写作是偶发性的，而非持续性的。要完善一个革命党的理论体系就不能将理论上的工作交由个体的兴趣、自负、心情和个人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的政治报是以推进革命运动为基本目标的，而非把某位个人打造成洞悉一切的大理论家、评论专家或是什么左派公共知识分子（注：此处论述的一贯为中央机关报，基层政治刊物见“群众路线与出版物运动”部分）。这一问题列宁已经论述的很明了了：

“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弗·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就让我们转向这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来做些详尽的分析。恩格斯曾写道共

产主义者的斗争在于“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经济实践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列宁也曾提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弗·列宁《怎么办？》）。但在革命进程中，各类组织却在大喊“党指挥枪”、“党领导罢工”以外总是忽略“党掌握笔”的重要性。文章应当由党的编辑部产出并由党的编辑部负责，这一条规则不应被改变或做任何替换：文章不该由独立撰稿人产出并由党的编辑部负责，这无疑是将理论斗争这一战线的控制权交由给了组织之外的写作者；文章也不该由党的编辑部产出并让任何个人负责，存在的任何问题需要在编辑部的组织层面被解决；文章更不该由独立撰稿人产出并由独立撰稿人负责，这将让政治出版物的写作成为又一个运动原子化的受害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治报应该是明确的由集体写作、修订、发布、扩散的产物，而占主要领导地位的应当是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

机关报的任务是用有限的文字无法述完的：一份合格、成熟的中央机关报应当传达组织的理论与革命号召、评析时事与革命态势、传达如翻墙之类的技术性内容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标准是产出活的理论，而非基于表达公式的通稿。死的理论已经被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资产阶级理论的代理人们重复了几万遍了，一个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不需要做论文综述，而是推动当下对过去的、现在的斗争的理论与认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命力在于，革命运动和理论的发展从未止于重要理论家的逝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共产党人的斗争并没有在卡尔·马克思于1883年离世后失序、静默，因此也绝不应该被机关报的写作者们当成死的理论、语录甚至是教经对待。

群众路线与出版物运动

“脱离群众路线”这一指控平等地从四面八方落到了无数左派刊物上，而要实际地解决这一问题就首先要充分认识群众路线本身，即“群众路线是什么”和“群众路线不是什么”。

让我们先从“群众路线不是什么”开始分析：群众路线首先不是搞庸俗的、毫无思想性的内容。那不是群众路线，而是化为了控制群众的娱乐化大环境的一部分。革命党不该忘记制作出版物与宣传的出发点是什么，即传达的是我们的革命理论和完成思想与实践上的动员。

在形式上，我们可以通过通俗易懂的媒体形式与介质将理论渗透入资本主义社会，但不应该将自己解构成一条条短语与语录并融成海量的、短平快的媒体内容的一部分，在夹缝中嘶哑地喊一声“加入我们”或者“共产主义万岁”之类的话语；

在内容上，革命党的出版物应当拒止只为了博人眼球和提振流量的烂俗内容。以2025年7月到8月的江油群众抗议事件为例，当时参与镇压和封闭消息的江油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副书记等人被互联网“开盒”，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是流量至上的自由派媒体和民粹主义者们钟爱的信息，但这不应该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要视角的革命刊物应当转载的内容。就如同共产党人在政治斗争中不依赖恐怖主义的刺杀一样，理论斗争中也不应当将攻击一个复杂官僚体系中的个体当成主要目标：传播几张涉事警察的照片就如同拿起放大镜观察庞大国家机器中的几个螺丝，这皆是互

联网世界的狂欢而不是对阶级意识的培养或任何形式的理论输出。其负面效果也是明显的，读者将不解于一个左派组织到底是走针对阶级矛盾的社会主义路线还是走针对个人的恐怖主义路线，就如同先前论述的那样，共产主义者的出版物不该成为低俗小说。

这样的互联网狂欢在内外网以天为单位进行着，反对中共的自由派们就曾在海外展开过名为“爆料革命”的网络运动。如目前涉嫌诈骗的郭文贵就曾在2017年6月爆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岐山和某某女星有染等新闻；此外，还有如所谓以“中南海听床师”为中心来传播关于中共高层的阴谋论，以此而非物质条件基础来演绎地推理出中共下一步的政策方针和中共明年就要灭亡的预言。

显而易见的是，革命者不该为了迎合流量而抛弃掉辩证的论述过程，或将目光从普罗大众的斗争移开，转而着重书写中南海中的阴谋论或纠结某位官员到底有没有生活作风问题。那么出版物真正的群众路线是什么？革命者的答案应当是：通过线下支部和政治中心的运作来产出由工人学生所写、基于工厂和学校实时动态而写的出版物，并在当今的中国建立一个长期缺位的群众政治刊物传统，即出版物运动或办报运动。

必须澄清的是，所谓“运动”不代表出版物的设立和编辑是狂飙突进并迅速凋落的思潮，其本质仍是需要长期运营的理论斗争。这样的理论斗争之所以会以运动的形态发展是基于两个重要性质：游击性与统一性。游击性代表着基层的群众政治刊物将以多种形式现身。在工作场所中，政治刊物将会以揭露性传单和小册子的模式出现；在学校中，政治刊物将以理论学习册、社会评论等形式涌出；在线下，这些报刊可以是精美制作的宣传册，也可以是白纸黑字的一擦揭露材料；在线上，这些出版物可以是长视频、短视频、社交媒体文章和各格式的文件；就算一个刊物被中共的监察体系查禁，其余的出版物也能继续运行。可见，办报运动的游击性决定了其较低的参与门槛、相当灵活的标准和面对监察体系的弹性。这类办报运动绝非新的事物，列宁就曾如此评论俄国早期的揭露经济情况的出版物：“既然各行各业工人的贫困和痛苦有许多共同之处，‘叙述工人生活的真实情况’就使所有的人赞赏不已。甚至在最落后的工人中，也产生了一种想‘发表文章’的真正热情，一种想用这种萌芽形式的战争去反对建立在掠夺和压迫的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制度的高尚热情…… [揭露类出版物] 可以成为唤起阶级意识、开展工会斗争和传播社会主义的起点”（弗·列宁《怎么办？》）。

这也是中央机关报和基层政治刊物最显著的区别。如上文所述，中央机关报强调完善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和“党掌握笔”这一绝对原则；而工人、学生所书写的大量基层政治刊物可能仅关注自己所处行业的困境和“什么是共产主义？”等基础理论的普及，笔者、编者可能来自不同的地区与领域，甚至持有不同的立场与意识形态。这代表着若出版物运动不受指挥与协调，基层政治刊物将带着其自然的原子化模式和倾向。列宁也充分提到了这类运动的两面性：“这种揭露可能（在革命家组织适当利用这种揭露的条件下）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的开端和组成部分，但是也可能（而在崇拜自发性的条件下则一定会）导致‘纯粹工会的’斗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弗·列宁《怎么办？》），在学生群体中也同理。和如今逐渐僵化的各组织的机关报一样，基层群众的政治刊物在运动还未发展起来前就已经面

面临着抉择：是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基石还是成为一篇篇市井杂谈？

借此我们必须强调出版物运动的另一大性质，即统一性。此处的统一性特指出版物在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统一，它是共产主义革命党的统一领导的直接或间接产物。换句话说，考虑到出版物运动的规模和游击性，其不会也无法由革命党全权控制，但党在革命中的统一领导能够作用于出版物运动这一总革命运动的分支。领导工人和学生运动的党支部需要在工作场所或学校中举行理论教育、辩论和研讨，这将决定了党支部所在之处的基层政治刊物在理论上的统一。以工人运动为例，工作场所中的线下支部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广泛的政治教育和建立地区编辑部的方式将工厂中产出的文章、传单和小册子从工联主义的政治刊物转化成带有革命性质的出版物**，此外，这一工作还需将各地区阶级斗争的实际进展抄送至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以成为组织自己的情报通讯源。只有这样，党与运动中的出版物才能“*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弗·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当然，统一性与本文先前批判的机械复制处于完全不同的路线，基层的政治刊物是以统一的理论体系来产出针对身边具体议题的新内容，而非依靠复制名号或语言表达习惯得来的政治空谈。一百个受共产主义革命党所影响的政治刊物可以有一百个不同的名字、来自一百处不同的场所、针对一百种不同的话题，但其立场和思想应保持着高度统一。

统一性也将是“合法出版”这一迷思的解法：赤裸的现实是当今的中国不存在任何涉及到政治的“合法出版”，当政治刊物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审查时，刊物为了暂时留存或广泛传播就面临着内容的去政治化。然而统一性得以在这种非理想环境下给予了各出版物一定的写作纵深并保证了对应的宣传效益。首先，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持着写作者在被迫转向如文化批判等略显“不痛不痒”的话题时也能透露出部分锋芒；其次，出版物运动的统一性还包含着视觉设计等领域的统一，如排版风格、插图、配色等要素就算不加上激进的文字也能成为革命运动在这处工厂、这所学校存在的佐证，即沿用运动中其他出版物的影响力。可预见的是，这些统一的文字和像素点将成为中共监察体系的噩梦，如同幽灵一样宣示着“*我来过，我又来到，我还将重临！*”（罗莎·卢森堡《柏林秩序井然》）。

结语：致读者与未来的革命者

我们需要一同面对的是，无论是终结政治报的危机、建立起中央机关报还是组织起出版物运动似乎都无比困难，这是无可辩驳的。的确，海量政治报的问题和群众政治刊物在中国的长期失位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这表明政治报方面的革命工作是长期的、持续的、不断的且辛苦的，但它不是不可现在开始的。我们那些坐等革命时机成熟的“同志们”总是劝说“革命的时机未到，等到时候再起身行动也不迟”并列如台海战争、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共党内政治改革等不能再模糊的时间点，似乎到那个时候他们就能直接起势、拉起一支能和统治阶级对抗的革命队伍、夺取政权。然而现实是，当他们期盼的革命时机真的到来时，若政治报的危机未能被解决，革命的胜利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不过是美好的神话。在所谓革命时机到来之时，必然出现的将是全国的无政府状态，到那时“*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了。一切纲领观*

点和策略观点都受到群众行动的检验”（弗·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受“检验”的时刻，几百个零零散散的、热衷于政治骂战和机械复制的左派组织连一句明确的、统一的口号都没能力发出，只能眼看着革命时机的流逝。

所以，终结危机和随着路线发展政治出版物不是什么可以等到时机成熟再解决的问题。与这种论调相反，只有终结政治出版物的危机与推动其健康的发展才能给予革命组织创造或把握时机的基本条件。而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则离不开有着自觉的革命者们，这包括你，一位读者同志的加入与工作。

可能这是你阅读的第一篇共产主义的理论文章；可能你长期作为一名读者但尚未准备好成为一名革命者，觉得革命这个概念或“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过于地遥不可及；或者你已经将“革命者”这个身份套在了自己身上（非常好，这是第一步）。然而，无论你在上述的哪个阶段都不会阻挠你成为一位真正的革命者，将一位左派政治爱好者和革命者所分隔的不是年龄、阅历又或者是身份，而是是否具有行动起来、组织起来的觉悟。

读者同志，是时候停止观望、犹豫和对革命时机的幻想了，政治出版物作为我们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在党组织和群众的共同斗争中得到发展。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如果不走向革命就是走向慢性死亡。

革命者什么样的“上进心”是合适的？

作为对 [《论仕途主义问题》](#) 一文的补充

共产党不只是一个“革命工厂”，将招募而来的革命者们组织起来进行工作；党更是一所“革命的学校”，它不接手现成的后便拿来使唤，而对党员进行培养、训练。党力量的增长因此不只是反映在人数上，更反映在每一个党员的素养上。

这样的党要求的革命者因此坚决不能是不思进取的。如果一个人接受了现在的自己并十分自满，不寻找需要改进的地方并作出行动，就跟不上党整体的节奏。每一位革命者遇到障碍时都不该养成回避或者甩锅的心理，幻想着总有其他同志来帮忙，反而要攻克自己的不足。党外部施加的一切教育和引导如果没有这种“内驱力”——换言之，革命者自身的进取心——就只能和对牛弹琴一样起不了实际作用。

所以我们期待的党员是时时刻刻都在进步、学习的，哪怕还是一名基层时就有将自己的能力提升成干部水平的决心。这样的党员不会拒绝党布置的挑战性任务，即使是自己不擅长的短板；这样的党员不会躲开党赋予其肩上的期待。

但是，这里必须区分积极的“进取心”和跑偏了的“野心”的区别，这也是本篇文章的写作目的。必须警惕看似上进实则仕途主义、功利主义的人，尽管在形式上都是追求“人往高处走”，但前者是探索自己的潜能、积极为党作出更多贡献、想要成为更优秀的革命者，后者则是想要坐稳高位、满足自己幼儿一般的“封官加爵”幻想、获取名誉和认可的野心家。

后者对于革命队伍的损害是极大的。因为在思路上的他们的“进取心”就是本末倒置：同志们的认可是积极贡献的副产物而不是积极贡献的目的，一个革命者为党服务本该以为革命添砖加瓦为方向，但在野心家那里成为了掩饰自己个人期待的外衣。在党内承担领导职务、负责某项工作本该是专业化分工的一种体现，让党组织运转更加高效的一种方法，但对于他们成了一种“在历史留名”的手段，或者说，成为心中幻想的那个自己而不是党期待的革命者的方法。

无论仕途主义还是功利主义，导致他们这种扭曲的进取心的，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一种精致利己的思维模式。资本主义的世界教育我们只有用这种思维思考才有生存的空间，异阶级的这种压力渗透到革命组织内因此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深刻反思自己的动机，并充分了解身边的每位革命者，以确保病态的“野心”

构成对整体的损害时能及时制止。

希望组织生活能让中国先进的共产主义者们鄙视、遗弃这种幼儿的扮演游戏！让我们每人都以革命的利益为出发点，保持上进。

《怎么办？》导读

《怎么办？》原文：<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01-1902/index.htm>

在今天的中国，对于真正想要推翻现存秩序的革命者来说，单靠零散的抗争和一时的激情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必须回到经典的理论源泉中去寻找方向。列宁的《怎么办？》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它并不是一篇抽象的政治论文，而是一份带着战斗意味的文献，回应了当时俄国革命运动内部的激烈争论。不过，由于这本书的时代性很强，里面的许多词汇和概念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显得陌生甚至晦涩。很多人第一次读时，往往会觉得“半天都没读懂列宁到底在说什么”。因此，如果要把它作为教育材料，就必须对其中的关键概念加以解释。这也是这篇导读被写出来的原因。

当时，以《火星报》为中心的革命派强调建立一个有纪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全国性政党，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零散的工人斗争提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而与之对立的“经济派”，则主张工人运动应当局限于争取工资、工时等经济利益，政治斗争应交给资产阶级自由派去进行。他们攻击《火星报》，说它脱离群众，搞“教条主义”，甚至指责列宁等人要把外来的“意识”强加给工人阶级。列宁写下《怎么办？》，就是为了回应这种攻击，明确指出如果没有理论的引导，工人运动就会停留在工联主义的层次，无法触及国家政权的问题。这里就涉及到了组织形式的差别：“经济派”的组织，是所谓“手工业式的组织”，这些组织往往是松散的、地方性的，依赖个人关系和临时性的联系，缺乏统一的战略和纪律；而列宁想要的组织，是“工业化的组织”，这意味着集中、分工明确、纪律严密，能够像现代工厂一样把分散的力量凝聚为整体的“机器”。列宁认为，如果革命党仍停留在“手工业式”的状态，就无法承担推翻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因为“手工业式”的组织和工会有一样的局限性：这些组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保护工人利益，但是其逻辑是行业化、地方化的，这导致它们往往把斗争限制在特定行业，甚至是特定企业的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改善的范围内，从而在特殊条件下导致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与相互敌视（只有在“工业化”的政党的领导下，工会才不会导致这种恶果），甚至在关键时刻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缓冲器，帮助统治阶级消解工人的革命性。因此，必须超越“手工业式”的狭隘框架，建立真正能够领导政治斗争的革命政党。

列宁在书中也批判过所谓的“批判自由”。这在当时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一部分人提出的口号，他们声称要摆脱“教条”，主张党内思想“自由”，实际上却是为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开脱。列宁指出，这种“自由”并不是无害的思想多样性，而

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原则、让党组织陷入分裂的借口。换句话说，“批判自由”在当时就是一种打着理论旗号的投降主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反对党内的讨论和批评。恰恰相反，他非常强调党内辩论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充分的争论，才能锻炼党员的理论水平，才能使党在思想上保持活力。列宁所反对的，是那种以“自由”为名、实际上否认党的统一意志和纲领的做法。他容许真正的“批评自由”，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党的纲领的前提下，党员之间可以展开严肃的争论，可以对策略和方法提出不同意见。这样的批评不是破坏，而是建设性的，是为了增强党的战斗力。列宁曾经说过：“我们认为必须尽可能（甚至不惜在一定程度上抛开美好的集中制模式，不要绝对服从纪律）让这些小组有发表意见的自由，让全党有可能来衡量分歧的深浅，判断不彻底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问题，以及表现在哪一方的身上。”（《列宁全集》，第九卷，《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对于解决党内分歧的态度一向如此：用富以弹性、包容，以及最诚实的意愿来面对他的政敌们并进行讨论。

接下来，就是列宁提到的“灌输”一词，列宁在事实上并没有用过这个带有歧义的说法，他强调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从外部带到工人运动中去”，这里的“从外部带来”（внести извне）并不是把工人当作被动接受的容器，而是强调先进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历史使命。在中共早期翻译中，使用了“灌输”这样的词汇，带有一种单向度、被动接受的意味，容易让人误解为社会主义理论是强行压在工人头上的东西。另外，中文版译文中常见的表述“工人阶级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意识，也需要谨慎对待。列宁在原文中写的是：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своими собств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может выработать только тред-юнионистское сознание” 其意思是说工人在斗争中必然自发产生对雇主的对抗的意识，比如要求涨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这种意识是宝贵的，但它仍然是不完整的（因为这是工联主义的），无法自觉地上升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对资本主义整体的批判，是在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的，需要通过知识分子有组织的传播和教育才能与工人运动结合。所谓“外部”，指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结合，而不是单方面的“灌输”。正是这种翻译上的偏差，使得后来的理解中容易出现把工人阶级描绘成完全被动接受的对象，而忽视了他们在接受理论、转化理论并通过斗争实践加以发展的主动性。

在这里，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与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存在矛盾。葛兰西强调工人阶级会“产生”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党组织直接从工人阶级中“生长”出来；而列宁则强调革命知识分子往往来自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因此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外来”的。看似矛盾，其实并不冲突。因为列宁所说的“外来”，并不是指阶级立场上的外，而是指理论形成的社会条件。社会主义理论最初确实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形成的，但一旦这些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结合，他们就不再是“外来”的，而是成为工人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正是这种结合的结果。换句话说，列宁强调的是理论的来源（这自然也不排除部分先进工人完全可能直接成长为有机知识分子，承担起理论与组织的双重任务），葛兰西强调的是理论与阶级的结合，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需要注意的是，列宁在1905年革命之前，并没有提出工人阶级能够自发地产生共产主义意识。当时他的立场是，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只能产生工联主义的意识，必须通过知识分子在理论的引导才能上升为社会主义意识。而在1905年革命之后，列宁的表述发生了变化。他看到工人群众在大规模政治斗争中展现出的创造力，认识到他们完全可能自发地产生一定的社会主义的意识（事实上，巴黎公社、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意大利红色两年、1926年英国总罢工，乃至后来的1953年东德工人起义、1956年匈牙利革命、法国五月风暴、1971年东巴基斯坦解放战争、1974年葡萄牙革命、1980年韩国光州起义、1988年巴勒斯坦大起义等革命斗争都证明了这一点）。这并不是对《怎么办？》的否定，而是对它的补充和发展，因为事实也始终证明，革命需要一个有组织的政党来集中力量，因为在自发形成的巨大革命浪潮中，工人阶级的斗争不断爆发，却常常因缺乏一个成熟的群众性革命党来集中力量、制定战略，而面临被国家机器镇压或被改良主义力量收编的危险。革命高潮的突然性与革命党建设的长期性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如果没有事先准备，群众的英勇斗争往往只能化为历史当中的悲壮插曲。更进一步说，工人阶级在现实斗争中出于多种原因，往往更容易信任那些在革命前就已经存在的独立工人组织（尤其是工会、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化的共产党等）。其原因在于：第一，这些组织与工人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能够在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等具体问题上提供直接帮助；第二，它们在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信誉，工人自然会把它们视为“自己人”；第三，工人阶级的多数人由于受教育机会有限、政治经验不足，更倾向于依赖那些能立刻带来实际成果的组织。若缺乏独立的工人组织，工人们则会转而信任那些在关键时刻能为他们利益发声的力量，这些可能是自发形成的群众组织，甚至是自由派的团体。问题在于，这类组织极易被资产阶级收编：一方面，资产阶级掌握资源与舆论，可以通过让步、收买或法律框架把这些组织纳入体制；另一方面，这些组织本身必然缺乏革命纲领和长期战略，容易在压力下转向改良主义。因此，幻想在革命高潮中“临时建党”是行不通的。没有长期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建设，工人阶级的信任必然会流向那些更早出现、看似更可靠的组织，而这恰恰会让革命的主动权落入资产阶级之手。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决反对那种“现在群众思想犬儒化了，而我是‘理想主义’者”“万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立姿态。群众在现实中表现出对资产阶级的顺从，并不是他们主观上选择了屈从，而是社会结构和统治阶级霸权强加的结果。国家机器、舆论工具、教育体系无时无刻不在塑造一种“常识”，迫使工人阶级在缺乏组织和理论武装的情况下接受现存秩序。即便工人阶级在主观上否认现有秩序，也会因为资产阶级把剥削关系的再生产异化为生存的条件（“你不参与竞争，就会饿死”），而选择在行动上服从资产阶级。若革命者因此轻蔑群众，简单的把他们视为“思想落后”，就等于否认了这种结构性压迫的存在，反而陷入了精英主义的陷阱。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在群众的日常斗争中发现他们的创造力和潜在的社会主义意识，把零散的抗争提升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群众的自发行动中固然存在矛盾和局限，但这恰恰是革命党存在的意义：不是自我标榜为“清醒者”，而是通过长期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建设，把群众的经验与先进理论结合起来，使他们在斗争中不断突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只有这样，群众的英勇斗争才能避免被收编或镇压，真正转化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因此，《怎么办？》并不是一部“精英主义”的宣言，而是一部关于如何把工人阶

级的自发斗争提升为有组织的政治斗争的著作。它的真正意义在于，指出了革命运动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理论核心和组织核心，否则就会被自发性所淹没，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俘获。今天我们重读《怎么办？》，必须看到这一点。在一个高度集权、资本主义逻辑与官僚专制结合的社会里，如果没有理论的武装和组织的集中，任何零散的抗议都很容易被吸收、被瓦解。

《怎么办？》之所以在今天仍然有意义，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革命者如何在敌人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建立起自己的力量？列宁的回答是，必须有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必须有一批能够把理论与群众斗争结合起来的革命者。这样的政党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而是需要通过长期的斗争、教育和组织工作来建立。它既要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之中，又要有足够的理论高度去看清整个社会的结构和矛盾。今天，当我们面对新的压迫形式时，这个道理依然没有过时。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是革命的起点，但如果没有理论的引导，它就会停留在“不完整”的状态。只有当这种自发性与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革命才会真正成为可能。这正是《怎么办？》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信仰抗命：中共党国体制下的宗教问题—— 论中共与基督教的冲突及其制度根源

一、被围捕的信仰者

2025年10月，中国当局对全国多地的家庭教会发动了新一轮大规模镇压。北京锡安教会的牧师金明日与多地信徒被捕，数十处聚会点被查封，超过一百五十名信徒被拘押或传唤。这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自2018年以来持续不断的对家庭教会的系统性迫害的一次集中爆发。

一个没有公开政治诉求、仅在私人空间中祈祷、研读圣经的信仰团体，为何被一个自称“为人民服务”的国家视为“威胁”？这个问题触及中共党国体制的关键所在：**在一个把权力宗教化、把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对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垄断基础上的政体中，一切独立的信仰都被视为叛逆和威胁。**

二、从无神论到“政教合一”的反动

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以激进的无神论为标志，那时的打击宗教，尚以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式出现；

而当今的中共对宗教其实是“非常友好”——前提是宗教服从于中共的控制与驯化。那些“愿意帮助他们安抚人民、麻痹人民的宗教”，如少林寺、武当山、灵隐寺等，香火旺盛，就连中共的高官也都会偷偷的祭拜这些高高在上的神佛，祈求仕途顺利。宗教局与统战部也如同资本主义企业部门运作，把信徒数量、香火收入、境外交流纳入统计与考核。

中共对宗教的态度已不再是排斥，而是驯化与利用：**凡愿为政权祝祷的神明可以存在，凡不愿臣服的神明必被驱逐。**

因此，当不受中共“三自两会”宗教系统领导的家庭教会发展到一定规模、存在对中共统治产生“思想独立”的威胁的可能时，被打压便成为必然。2014年浙江“拆十字架”事件，是家庭教会进入“严冬”的序曲；从此“宗教中国化”成为国家政策——从理论到实践，一步步将信仰纳入中共国家意识形态机器。

对此，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凤岗一针见血：“宗教中国化的主要目的不是文化上的同化，而是政治上的驯化。”

三、虚假的信仰自由与意识形态霸权

中共官方常以“教会未注册”为由打压家庭教会。然而，这种解释只是一种虚假的掩饰。正如独立候选人在人大选举中屡遭阻挠一样，注册本身便是一个**服从性测试**。

所谓“依法登记”，其实是要求宗教组织接受党的政治领导，接受意识形态审查，并将讲道内容、财务收支、人员活动完全纳入国家控制。**这不是注册，而是招安书。**

当前的中国不存在真正的信仰自由，只有精神的房间里的大象——中国特色意识形态霸权。

国家不承认人的思想具有的自主性和自由，不承认信仰能独立于政权之外。这正是中共意识形态霸权的本质所在——它不是无神论，而是**统治神学**：一种利用权力去反宗教，否定宗教的政治宗教。

而且，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废除作为人民幻想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现实的幸福。**”

这并不是要求通过思想批判去“取消宗教”，而是要求**通过政治斗争去消除使人需要宗教，需要幻想的千年王国的社会根源。**

马克思反对的不是信徒的自主信仰，而是造成信徒必须借幻想寻求安慰的那种现实——压迫、贫困与异化。

就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束缚。如果无产阶级本身的反对资本主义黑暗势力的斗争没有启发无产阶级，那么任何书本、任何说教都是无济于事的。**

由此可见，共产主义者反对宗教，并非从宗教批判出发的“思想启蒙”，因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无神论宗教，而是从政治经济批判出发的人的社会解放。

只有在废除压迫与剥削的现实制度后，宗教的扭曲的社会根源才会走向自然的消失。

四、无产阶级与信仰者的共同斗争

马克思曾说：“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温情之心。”这不是嘲讽，而是同情。宗教之所以存在，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世界充满不公，人民不得不在痛苦中寻求活着的意义所在。

因此，当今日的中国工人、青年、知识分子走入家庭教会，他们并非出于愚昧（毕竟当前的中国人都接受了至少九年的中共无神论教育），而是因为现实的异化迫使他们寻找一条不在中共意识形态范畴内的思想道路。

这种精神的抗争，虽然以宗教形式出现，但它所指向的，是一种**否定现存秩序的潜在力量。我们可以叫它：信仰抗命。**

它拒绝了中共编织的叫做“中国梦”的新形式的千年王国学说，放弃了对官方的“岁月静好”宣传的信任和忠诚。即使这种怀疑，这种抗拒，是以相对消极和温和的态度显现的。

然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楚：这种力量若不被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就会陷入幻想的乌托邦。宗教团体的内部，存在着逃避现实斗争、顺从原有的统治秩序的倾向；也存在着互不理解乃至敌对的分裂习性。

因此，**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必须保持独立与领导地位**，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去教育和引导信仰群众，使他们真正的认识到：

“天国的正义”只有通过人间的斗争才能实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的期盼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解放才能具象化。

当信仰者愿意将信仰从幻想转化为实践，将“神的王国”理解为人类平等自由的社会，他们便与革命者站在同一条战线。

这种转化，正如拉美解放神学、韩国民主运动中的进步信徒所展现的那样，是从宗教意识中生长出的政治觉醒。

因此，我们并不从外部：禁止宗教的存在合法性，而是从内部：超越宗教的原有的意义和价值——通过阶级斗争的现实革命实践，使宗教的信仰之力转化为人类解放的一种深厚的精神力量。

五、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对待宗教的策略：联合—斗争—超越

宗教问题从来不只是思想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宗教的根源不是人的错误意识，而是被压迫社会的现实。

因此，对于宗教的革命性批判的任务，不能停留在所谓的“无神论式思想启蒙”的层面，而必须转化为**现实的阶级斗争策略**。

（一）联合：承认信仰群众具有的革命潜力

宗教团体在被压迫阶级中往往有广泛群众基础。许多信徒的信仰中包含着对公义、平等和博爱的追求，这些情感在现实斗争中可能成为觉醒的起点。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应当以同志般的态度接近信徒，而不是以学究的姿态去训诫

他们。“在我们看来，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的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对虚幻的天堂的看法上的一致更为重要。”

在今日的中国，广大宗教信众——尤其是工人、农民、底层青年中的信徒——与无产阶级处于同一被压迫的位置，他们的反抗情绪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具有一致性的。

因此，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联合信仰群众，尊重其宗教形式中的人道、互助和自由精神**，通过实际斗争将这种精神转化为反抗的力量。

（二）斗争：揭露宗教团体内部的保守与逃避

但这种联合并不意味着放弃革命性的批判。

宗教团体内部始终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被统治阶级利用的保守宗教团体，二是被压迫者寄托希望的解放宗教势力。

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揭露前者、争取后者。

我们必须不断指出：真正的“公义”不可能在天堂，而只能在人间实现；真正的“幸福”只有通过人间的神圣斗争才能够被获得。

革命者在与信仰群众联合的同时，必须始终保持意识形态上的独立，防止斗争被“温和化”、被消解为被动的忍耐和妥协。

（三）超越：通过社会解放消灭宗教的扭曲的社会根源

最终目标，不是让宗教“服从”于无产阶级，而是让宗教在无产阶级的胜利中失去其可憎的社会根源和必要性。当压迫、贫困与异化的根源被消灭，宗教就会自然地、历史地衰落或者说是不再成为人间痛苦的倒影。

正如马克思所说，废除宗教的幻想，意味着要求一个不需要幻想的世界，人能够不再仰着头，在现实的重力的束缚下，敬仰着神的王国，而是真正的自主的从必然王国飞跃进自由王国。这不是国家强制的“无神论”能够带来的功绩，而是人的社会解放的必然结果。

因此，**无产阶级的宗教策略必须是辩证的，务实的，革命的：联合信仰群众，与保守的宗教意识斗争，最终超越宗教的固有形态。**

这一过程本身，正是从简单的“无神论思想批判”走向“人的真正解放”的路径。

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信仰者的抗命才会成为革命的火种，而不是逃避现实的避难所。

六、结语：从宗教迫害到人类的解放

今天的中国，不仅有物质的剥削，也有精神的桎梏。中共党国体制在政治上是一党专政，在经济上是官僚资本主义，在文化上是意识形态垄断。家庭教会的命运，只是这个体制压制一切独立社会力量——无论是工人革命组织、独立新闻媒体、还是自主的信仰共同体——的缩影。

历史的经验表明：解放宗教的唯一途径，不是国家无神论的强制，而是**包括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建立起不再有压迫和奴役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无产阶级大革命。**

当无产阶级通过自身的革命斗争摧毁了异化的生产关系，人们便不再需要借助幻想来脱离苦难。

那时，信仰的力量——对公义、博爱与人性的渴望——将转化为现实的人类解放运动的精神。

正如曼德尔所言：“历史没有保证解放的必然性，但解放的希望在被压迫者心中燃烧。”

这希望，既可以以“天国”的语言表达，也可以以“革命”的语言表达；但它的实质和趋势是共通的——

那是人类拒绝被奴役、追求自由的神圣的和革命的斗争。

“人的良心和信念是庄严和不可侵犯的。人人都能自由地拥有使他幸福的信仰和信念。任何人都不得迫害或侮辱人们的宗教信仰。社会民主党人就是这样认为的。”——罗莎·卢森堡《教会与社会主义》

当思想与信仰的自由成为劳动人民的天赋权利，当宗教的幻想转化为现实的斗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社会形态。

针对没有翻墙渠道的读者们

推荐 VPN：魔戒

国内直连官网（任选其一）：

- <https://mojie.app>
- <http://mojie.host>
- <https://mojie.co>

打开官网注册账号（邮箱注册，常用邮箱即可），登录后台，购买套餐（支持微信、支付宝）

邮箱推荐使用 Proton，其家的 VPN 也有安全保障：<https://proton.me/mail>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国统一的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一种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有机会投著实践的理论纲领因为背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实支持，而不得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寰宇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华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寰宇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华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中国和华人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寰宇内的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
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以双手开拓的、属于新世界未来的晨曦！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

Telegram (电报) 频道:

<https://t.me/revcommunist0cn>

电台 Youtube 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Instagram 账号:

<https://www.instagram.com/revcommunist0cn/>